

西安地方志

2023年第一期(总第280期)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办



西安地方志

2023年 第一期 (总第280期) XI'AN DIFANGZHI



西安城墙——朝阳门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西安) 2023-SY005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办

2月6日，市地方志办组织召开区县地方志工作座谈会。市地方志办主任王鹰、副主任崔义萍、一级调研员杨军亚，区县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和有关业务骨干，以及市地方志办相关处室负责人等近3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卷首语

明天的中国

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苏轼有句话：“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说“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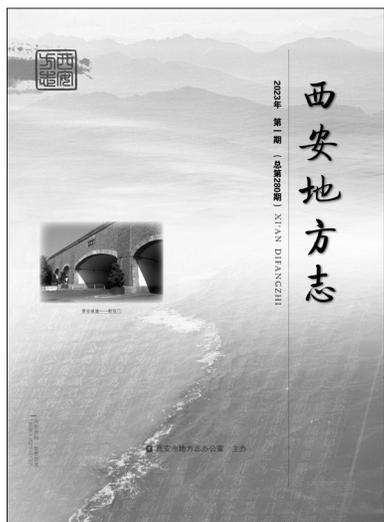
明天的中国，力量源于团结。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海峡两岸一家亲。衷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携手并进，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明天的中国，希望寄予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年轻充满朝气，青春孕育希望。广大青年要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格，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不负时代，不负华年。

——摘自国家主席习近平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



目 录



2023年第1期
(总第280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卷首语

01 | 明天的中国

城市前行

04 | 京昆高速公路西安段

西安方志文献

06 | 奏进《关中胜迹图志》原疏·毕沅

07 | 《重修辋川志》·胡元煥序

史料钩沉

08 | 秦魏第一次河西之战

10 | 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

13 | 西安城墙的保护神/王新民

学术交流

18 | 关学研究的新境界

——读《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史飞翔

23 | 论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原则/南剑飞

人物春秋

28 | 一心为公的辅佐者——周公

29 | 西汉廉吏——赵广汉

31 | 西安市第一届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长——张锋伯

西安风情

32 |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阳宫祖庵碑林

34 | 西安境内的秦岭七十二峪——涝峪

36 | 逗社火/每小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38 |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竹扎技艺



39 | 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丰镐“三灵”

民间故事传说

西安村落

41 | 刚家寨

43 | 百花村

44 | 东方红村

45 | 乡村文化振兴——东堡村村史馆

诗意长安

46 | 守岁/（唐）李世民

47 | 冬夜书怀/（唐）王维

志鉴动态

48 | 西安市区县地方志工作座谈会召开

48 | 《阎良年鉴（2023）》编纂工作培训会召开

49 | 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西光社区举行
社区志编纂启动仪式

49 | 碑林区开展志书“六进”活动

50 | 品古都前世今生——《阅读西安》出版发行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出史籍

22 | 玉树临风

30 | 沧海桑田

51 | 白首为郎

文苑

52 | 修志随想/沈桂红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王鹰

副主任：崔义萍

委员：高鹏 杨军亚

王耀珍 高长安

姚文东 刘辅国

郑红波 黄立峰

于涵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编：崔义萍

执行主编：高长安

副主编：于涵

责任编辑：闵莎莎

胡永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

市政府大院34号信箱

邮编：710007

E-mail: 674292617@qq.com

电话：029-86788731

刊号：（西安）2023-SY005

印数：700册

印刷：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
有限公司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门户网站：

<http://xadfz.xa.gov.cn/>

西安市地情资料数据库：

[http://xadfz.xa.gov.cn/](http://xadfz.xa.gov.cn/difangzhinew/)

difangzhinew/





京昆高速公路西安段

国家级高速公路途经西安地区有6条：北（京）昆（明）线G5；包（头）茂（名）线G65；连（云港）霍（尔果斯）线G30；福（州）银（川）线G70；西安绕城高速G3001；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高速公路。1991年至2010年间，为保障社会经济发展，陕西省及西安市投入大量资金新建高速公路，确保国家和陕西省“米”字形公路主骨架、主枢纽的全面实现，西安地区新建和改建了西（安）阎（良）、西（安）户（县）、西（安）三（原）、西（安）柞（水）、西（安）渭（南）、西（安）宝（鸡）、西（安）蓝（田）、西（安）商（洛）、西安绕城和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高速公路。

【京昆高速公路】编号G5，起点为北京天宁寺，途经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四川和云南6个省市，终点为云南昆明，全长2865千米。陕西段起于晋陕交界的禹门口，连接韩城市、渭南市、西安市、汉中市，途经合阳县、大荔县、周至县、佛坪县、洋县、城固县、勉县，止于宁强县棋盘关，全长558千米。西安段包括西阎高速公路和西户高速公路两段。

西阎高速公路

西安至阎良高速公路（简称“西阎高速”）为“米”字形公路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西安至阎良的大通道。西安至阎良公路项目原为一级公路，后因阎良为飞机城曾改为“西飞一级公路”，系陕西省政府为位

于阎良的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引进法国100座客机合作项目的配套工程。1996年7月陕西省计委批复西阎一级公路项目建议书。1996年11月陕西省计委批复西阎一级公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路线全长29.5千米，起于西（安）铜（川）公路K26处，终于阎良区谭家堡。路基宽度24.5米，总投资4.72亿元人民币。1997年初步设计文件完成并经陕西省计委批准，1998年3月施工图设计完成。省政府要求确保1998年建成通车，“先行开工、特事特办、先建后征”。

1998年4月，国家对“1990~2020年国道主干线规划方案”中的G40在陕西境内的通道走向进行调整。西阎公路作为国道G40的一段进入国家主干线路网，原开工的路段全部停建，但接到停工通知时，其中（F段）K46~K55+529已全面开工，铁路高架桥、清水河桥已完成下部工程，并完成部分构造物及路基土方。调整后的线路经过重新设计，公开招标，1999年12月开工建设，全线于2001年9月29日建成通车。

西阎高速公路起自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北段）新筑立交，经灞桥区、高陵县、三原县、临潼区、阎良区，止于阎良区的谭家堡，途经三区两县、十个乡镇，跨越渭河、清水河及侯西铁路，全长39.241千米，为四车道上下分向行驶，全立交，全封闭，全部控制出入，建设标准为平原微丘高速公路。行车速度120千米/



小时，路基宽度28米，行车道宽度2×7.5米，中央分隔带宽度3米，平曲线最小半径2000米，最大纵坡2.3%。桥涵设计荷载：汽-超20级、挂-120级，桥面净宽2×12米，桥梁设计洪水频率1/100、特大桥1/300、地震烈度8度，路面结构类型为沥青混凝土。概算为8.93亿元。交通部补贴2.26亿元，其余由陕西省自筹。实际建设投资82164万元。完成主要工程量：路基土石方341.97万立方米，路基排水5.5万立方米，路基防护5.99万立方米，沥青路面955.533千平方米，水泥路面45.534千平方米，小桥2座，特大桥2座长1803米，大桥2座239米，中桥25座长1833米，通道65道，涵洞146道，互通式立交2处，分离式立交10处，绿化37.252千米，收费棚3处，收费站1处，通信管道42750米。

2002年5月13日，陕西省交通厅组织交工验收，2002年5月15日起正式移交陕西高速集团北秦分公司接管养护。交工验收后，项目建设管理单位继续完善全线排水系统，完成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办理征用土地手续。2004年12月17~18日，陕西省交通厅对此公路组织竣工验收，工程质量评为优良等级。

西户高速公路

西安至鄠邑区高速公路（简称“西户高速”），是G5国道主干线在陕西境内的组成部分和陕西公路“米”字形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于2000年5月完成，6月29日交通部批复，6月底陕西省计委预审，9月30日交通部批复初步设计。

规划起于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南段河池寨，向西南方向经长安区祝村、义井、细柳、灵沼及鄠邑区的牛东、五竹、甘亭、五婣、天桥等两县11个乡镇，跨越沔河、涝河、潭峪河等三

条主要河流及诸多小河流，止于终点涝峪，与西安环山环游路相接，全程31.75千米，设有户县（现鄠邑东枢纽）、涝峪两个互通式立交，路基宽28米，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千米/小时。2001年3月开工，2002年11月20日建成通车。竣工决算为7.28亿元。西户高速主要工程数量：路基土石方440万立方米，排水工程浆砌片石42229立方米，防护工程浆砌片石7229立方米，沥青混凝土2451736平方米。特大桥1座566.08米，大桥2座511.18米，分离立交22座1015.03米，涵洞72道、通道57处，跨线桥8座，互通式立交两处。植树259183棵。在房建方面建设收费站2处，管理所1处，养护工区1处。2003年9月28日，市交通局受陕西省交通厅委托组织交工验收，工程质量评定为优良工程。2004年9月至2006年9月7日市交通局又陆续组织对西户高速机电、房建、绿化、户县连接线工程的交工验收，其中机电和房建评为合格，连接线和绿化评为优良。

2007年1月30日，西安市交通局和省高速集团举行西户高速公路交接仪式。根据省交通厅统一安排，西户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权从即日起由西安市交通局移交给省高速集团。



2003年，西安至户县高速公路





奏进《关中胜迹图志》原疏·毕沅

奏为恭进《关中胜迹图志》事：窃照陕省外控新疆，内毗陇蜀，表以终南、太华，带以泾渭、洪河，其中沃野千里，古称天府四塞之区。粤^①自成周而后，以迄秦、汉、隋、唐，代建国都，是以胜蹟名纵，甲于他省。我皇上威棱远昌，底定西陲。昨者金川小丑，自作不靖，王师挾伐，迅集鸿勋。关中当入川孔道，臣以樗栎^②庸材，仰承恩命，简任封圻^③，计今六稔^④于兹。其间名山大泽，每因公务，车尘马迹，大半经行。至于故宫旧苑，废刹遗墟，凭吊所经，率多湮沧桑。窃思山川胜迹，显晦有期。兹值国家治定功成，百废修明之日，兼以秦中六载以来，雨暘时若，年谷顺成，民力宽舒，废坠堪以具举，臣不揣固陋，每届辙迹经由，于邮亭候馆中，咨询钞撮。幸《大清一统志》及《陕西通志》堪以据依，此外如《元

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三辅黄图》《西京杂记》、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何景明《雍大记》诸书尚存什一，其中或有舛讹疑似，间摭一得之愚，旁加考证。岁月既多，遂成卷帙。荟萃已基于此日，兴修可待于他时。窃惟我皇上法健顺于乾坤，协智仁于山水。翠华遥涖^⑤，则翕河乔岳尽被怀柔；丹诏新颁，虽汉阙唐陵咸邀保护。是以不揆樗昧^⑥，谨将纂成《图志》三十卷缮成上下两函，敬上西清，仰尘乙览。窃比豳风^⑦、夏谚^⑧，聊述职于輶轩；载欣禹甸、周原，得时披于甫宸。谨缮摺具奏，伏祈睿鉴。谨奏。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十在热河行在恭进。

奉旨：毕沅所进《关中胜迹图志》，著录入《四库全书》。钦此！

①粤，用在句首或句中，起顺承作用。

②樗栎(chū lì)，樗和栎指两种树名，古人认为这两种树的质地都不好，不能成材。后因以“樗栎”喻才能低下。用亦为自谦之辞。

③封圻，意思指封畿、疆土或封疆大吏。

④稔(rěn)，年。

⑤涖(lì)，同“莅”，来；到(含尊敬义)。

⑥樗昧(chū mèi)，意思是愚昧无知。

⑦豳(bīn)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共七篇，为先秦时代豳地华夏族民歌。

⑧夏谚，相传流行于夏代的谚语。



《重修輞川志》·胡元煥序

輞川旧志，前明荣御史华所撰也。是书久已失传。甲午春，余承乏^①斯土，遍阅輞川诸图刻，复亲历其地，亟欲纂辑成书。甫理案尘，旋充秋闱。分校回任后，即举试事。次年乙未夏，修青泥渠暨蓝桥路等工，渐次告竣，复以办灾赈、堵商蝗、修城垣。四年以来，刻无暇晷，虽日在寒山影内，流水声中，而不能实访精求，一洗輞川面目。山灵有知，不亦笑风尘吏之鄙且俗耶？拟亦有志未逮，可惜也！丁酉夏，年丰人和，城务将竣，爰^②因省、邑二志汇

而集之，或搜之散见他书者，证之身亲目睹，又与乡人士详核之，旁参互证，合者存之，厘为六卷：曰图考；曰名胜；曰人物；曰金石；曰杂记；曰文征。俾^③古来胜迹，一展卷而了如指掌。庶几谢公之

履，卢生之杖，不知迷途。即身未能至者，亦可挟策而当卧游矣。

岁道光十七年，仲夏中浣^④，知蓝田县事胡元煥识。



輞川别业图局部（原载《关中胜迹图志》）

- ①承乏，暂任某职的谦称摄官承乏。
 ②爰，于是。
 ③俾，使，把。
 ④中浣，泛指每月中旬。



秦魏第一次河西之战

战国时期秦魏争夺的河西是指现陕西和山西之间黄河以西至洛水以东的关中地区。这块土地对秦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南过渭水可以锁定潼关，西过洛水可以直接压向渭河腹地，东过黄河可以覬覦山东土地，中条山南北都尽在掌握。可谓兵家必争之地。

河西之争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晋襄公时期先后在崤之战和彭衙（今陕西合阳县西北）之战中大败秦国，秦国东进之路被阻。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三国之中，魏占有原晋国与秦毗邻的主要地区，处于四战之地的魏国，为了有一个安定的后方，也继承了晋吞并秦国的战略目标。

当时的魏国国君是魏文侯，他是战国时期最先举起改革大旗的国君，他任用翟璜、李悝、魏成子等人进行改革，使魏国国势逐渐强盛。军事上启用吴起进行军事改革，使魏国拥有一支当时最强的军队——魏武卒。魏国联合赵、韩，西击秦，东击齐，南击楚，创建了由魏国领导而由韩、赵辅佐的中原霸权。而秦国自秦厉共公以后，政局不稳，数位国君或杀或废，国力日趋衰弱，加上西方及北方又有戎族入侵，在魏国的连续攻势下，陷入了被动挨打的窘境。

秦魏两国为夺取河西之地，自公元前419年到公元前330年，历经5次大规模战争，以魏国先胜后败，秦国先败后胜告终。

一、战争及战果

第一次河西之战从公元前419年到公元前408年，共计11年。魏国采用先建立巩固的前进基地，再大举进攻，后扩大战果的方略，有效地完成了夺取河西之地的战略目标，将秦军赶到洛水一带，扩大了魏国势力，给秦国以沉重打击。



魏国要进攻河西，必先渡过黄河。这意味着魏国在粮草、物资的补给上将面临巨大困难。公元前419年（秦灵公六年），魏国渡过黄河，在黄河以西的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修筑城池，建立前进基地，以便屯兵积粮进攻秦国。发觉魏国意图的秦国随即发兵进攻少梁。两

军在少梁交战两年，秦军先夺取少梁，公元前417年（秦灵公八年），魏军击败秦军，再次加固少梁城，牢牢控制了黄河上的少梁渡口。秦军则沿黄河修筑工事，防止魏军西进。

公元前415年（秦灵公十年），秦国眼见无法攻下少梁城，夺回少梁渡口的控制权。于是派兵在少梁城的北面修补繁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新建籍姑城（今陕西韩城北），意图三面围攻少梁城的魏军，然而依然无济于事。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魏军于公元前413年（秦简公二年）大举进攻秦国，魏军先是在郑地（今陕西华县西南）大败秦军，之后于公元前412年（秦简公三年）攻克繁庞，驱其民而占其地。

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魏军从黄河西岸再度向西往洛水推进，并且又修筑了临晋（今陕西渭南大荔）、元里（今陕西渭南澄城）两座城池。

公元前408年，魏军再次伐秦，一直打到郑县（今陕西华州东），攻克河西之地的雒阴（今陕西大荔南）、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两城邑，并筑城屯兵驻守。

魏国采取步步为营、鲸吞蚕食的战争策略，全部占据了原属秦国的河西之地，并在此设立西河郡，以吴起为西河郡守。河西成为插入秦国领土内的一把尖刀。据《吴子》记载，吴起任职期间，“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秦军节节败退，秦简公组织军民沿洛水右岸修筑长城，并筑重泉城邑（今陕西蒲城东南）以防御魏军，阻其继续西进。简公所筑长城又称秦东长城，南起今陕西华阴县东南小张村附近，由此趋向东北越过渭河，沿洛河右岸北上，经大荔、蒲城、白水等县，北止于白水县黄龙山南麓。今华阴县城东、蒲城县东南，尚有秦长城遗址。

二、战争影响

第一次河西战争充分说明了在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魏国经过变法，实力骤增，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常常大获全胜。秦国维持着早已衰落的旧制度，让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战争中常超遭遇惨败。战争的失败让秦国国君认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促进了魏国先进的制度向秦地的传播。历史的发展，已经把改革秦国旧制度的任务，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颁布“吏带剑”（在西周、春秋奴隶制时代，只有具备一定身份地位的奴隶主贵族才有资格佩剑）制度。次年，又允许百姓带剑。标志着百姓地位的提高。公元前408年（秦简公七年），颁布“初租禾”法令，第一次按土地亩数征收租税，承认土地私有，是地主制度的正式成立，反映出封建制的因素在奴隶制的秦国开始萌芽。

这一时期，秦国的改革十分缓慢，而且并没有特定的改革家。这一切似乎只是为了保住自己剩余的半边生存空间而已，处于被动。其改革的动力并不强大也不迫切，而且改革的目标也并不系统，只是在旧制度上赋予新的社会形势和发展情况而做出的事实变化而已，称不上是真正的改革。但这些变革已经带有了封建的性质，使自己的国家性质出现了变化，为日后的献公改革和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商鞅在秦国的两次变法



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远房宗族，称为公孙鞅。因为是卫国人，又被称为卫鞅。因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在商於十五邑，而被称为商鞅。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进行的社会改革中最彻底的一次，奠定了秦国对东方六国胜利的基础。

一、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

商鞅第一次变法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1）“令民为什伍”，定“连坐”之法

商鞅把李悝制定的《法经》带到秦国，加以公布实行。并把“法”改为“律”，增加了连坐法，从而把秦献公时实行的什伍制变成相互监督纠发的连坐制。商鞅的法律规定什伍间要“相牧司连坐”，即一家有罪而九家相揭发。若不揭发，则十家连坐。

受到连坐的奖惩极为严格，“不揭发检举的腰斩，检举揭发的同斩敌人首级一样受到赏赐，窝藏有罪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罪”。与献公时的户籍制相比，新制度对民众的控制明显加强了。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行按军功受赏的二十等爵制

为鼓励秦人作战勇猛，商鞅规定国家的爵位按将士在战场上斩获敌人首级的多少来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

官爵的提升与斩首级数相称爵位

从一级到二十级，愈高享受的待遇、特权愈优厚。如升到第十级“五大夫”时，赏赐给300户人家的税地，爵位在五大夫以上，除享有600户人家的租税供他食用外，还有权收养宾客，有爵位的人，犯了法，还可以减免，“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贬是指降低爵位，“已”是取消爵位。

官职和待遇的获得一律取决于军功，使过去的旧贵族，虽是国君的宗室族人，没有军功也不能获得爵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即不能靠出身就获得爵位，享受特权，这就严重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

（3）颁布垦草令，发展农业生产，重农抑商

商鞅把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带到秦国，在社会生产中，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领域。商鞅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把重点放在开垦荒地，商鞅制定“徕民致策”，招来地少人多的“三晋”之民到秦国垦荒。法令规定：三晋（韩、赵、魏三国）民众来秦国定居，就有地有房，三代免除徭役，不用参加战争，垦荒的特别优待，10年不交纳赋税，“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让秦国人当兵打仗，



新来的人种田解决粮食问题，从而使秦国的兵源和粮食问题都得到解决。

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息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本业”就是男耕女织的农桑业，“末利”是指制造和经营奢侈品的奇技赢巧、刻镂纹绣的一类手工业和商业。商鞅并不一般地反对工商业，在《商君书》的《去强》和《弱民》篇中，都称“农、商、官”为“国之常官”。“常官”是指国家固有的正常职业分工。他所反对的是商业中的“虱官”，即贩卖华丽好玩的物品，即被他称为“美”“好”的这两种“虱官”，也就是“末利”。“末利”并不是指一般的商业和手工业。

（4）推行小家庭政策

商鞅运用经济手段，促使民众分户，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就要出加倍的赋税和劳役。把大家庭分制成小家庭，成为户头的成年男子就不能再在大家庭的掩护下，游手好闲。这项改革促进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有好处。

二、商鞅在秦国的第二次变法

商鞅初次在秦国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国都中“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但是在秦孝公的有力支持下，新法得到推行。由于变法的成功，秦国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相当于中原国家中的相兼将军的官职。

秦孝公十二年，商鞅把秦国的国都从栎阳（今西安临潼区东北武屯镇古城村南）迁到咸阳（今咸阳市东北），进行第二次变法，其内容主要有：

（1）“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旧的井田制

“阡陌”是指1000亩和100亩田头上田界，“封疆”是指田界上的封土堆。在商周时实行井田制，宽1步（1步周尺长6尺，战国时1尺合今23.1厘米）长100步为1亩。百亩的面积是长宽各100步，为一家的授田数，所受的田要定期交换。商鞅“开阡陌封疆”的“开”字，有两层意思，一是破除旧时的田界，二是设立新的田界，杜佑说：“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给一夫。”秦亩比周时扩大一倍多，故要重新设立“封疆”。商鞅变小亩为大亩，重新设立田界，而且此次授田就不再收回，而作为耕者长期固定使用。这样土地就打上私有的烙印，由此封建土地关系就在秦国确立起来。

（2）普遍推行县制

商鞅“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还设有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和治安。县一级的令、丞、尉直接由中央任免。我国县一级的地方政权，于是正式确立。县级职官直接由中央任免，县级的行政权、兵权就集中于朝廷，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就建立了起来。

（3）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

统一度量衡器的目的是便于征收赋税和给官吏发俸禄，同时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一措施是在秦孝公十八年进行的。这一年，商鞅向全国颁发了一升的标准量器，即传世的“商鞅铜方升”，此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根据器上铭文“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





壹为升”的记载，测得秦时一升的容积为202.15立方厘米，秦一寸长为2.32厘米，一尺合23.2厘米。

(4) 按户征收丁口军赋

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史记·集解》说“制贡赋之法也。”《索隐》引谯周说“初为军赋也。”赋是指军赋，按户及丁口征收。湖北云梦秦简中《法律答问》有“令出户赋”即按户出赋。这是一种“舍地而税人”的措施，目的是限制游食之民。虽不种地的游民，也要缴纳军赋。同时也有限制官宦之家豢养食客，防止他们形成对抗国家的力量。

(5) 革除落后的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秦国长期与戎狄后进部族杂居，故保留了不少的落后习俗。商鞅是卫国公族之后，认识到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于是按照中原的风俗，将落后的习俗，如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等革掉。

(6) 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说之士

《韩非子·和氏》篇说，商鞅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是商鞅时秦已实行焚书，不自秦始皇帝始。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故将儒家的典籍加以禁止，采取焚烧的非常手段。游说之士们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故也被商鞅禁止。韩非子说他“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是禁止只凭一张嘴而获得禄位的行为，《商君书·壹言》篇说要“贱游学之人”，即要把人们的思想用封建的法制统一起来，以达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的目的。

三、商鞅变法的成功及其被杀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两次变法，推行新法达18年，取得得巨大成功，使秦国由一个

落后的、被东方各国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后，“秦人富强天子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商鞅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把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尽迁之于边城”，甚至连太子触犯新法也不宽饶，先黥了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后又将太子傅公子虔割去鼻子，由此引起秦孝公太子驷的不满。秦孝公二十四年死去，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一批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乘机攻击商鞅，诬陷他谋反。商鞅逃跑未成，遭车裂而死，并“遂灭商君之家”，妻子亦不得幸免。

商鞅虽被车裂而死，其改革的成果并未丧失，他为秦国制定并付诸实行的一整套新法，却并没有因他本人的死去而废止。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秦昭王时，荀子到秦国后，对范雎说，秦“四世（指秦孝公、惠王、武王、昭王）有胜，非幸也，数也”。这个“数”就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法制制度。

据传商鞅被车裂后，其门客收殓商鞅的遗骨准备偷运回商鞅故里卫国安葬，在黄河德丰渡口被秦国守军截获，当地百姓与守军便将商鞅遗骨草草埋葬于附近的秦驿山之下，后来法家的后学者寻访至此为商鞅立了墓碑，上书“商君之墓”。

明嘉靖《郃阳县志》记载：商鞅墓，郃阳（今合阳）县东四十里夏阳（今洽川）。参政彭有诗云“郃阳东去有荒村，卫鞅於今冢尚存。正是天留遗臭在，与人指点骂商君”，虽然这是古人反对商鞅和法家的诗作，但这已经表明商鞅墓位于合阳洽川镇确为历史事实，并且在明朝时期商鞅墓还保存完好。





西安城墙的保护神

王新民

一年一度的西安城墙灯会又恢复了，看着灯火灿烂的西安城墙，不禁想起西安城墙“死而复生”的往事以及为保护西安城墙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习仲勋、武伯纶和张铁民。

西安古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1370）在原隋唐长安城皇城墙的遗存上扩建而成的，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垣建筑。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是闻名世界的历史古都和 International 旅游城市，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大批游客来到西安，一看到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古城墙，无不为之惊叹。

但在改革开放前，西安城墙却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历代战乱以及解放后大跃进刮起拆城风等，西安城墙许多垛墙、敌台、墩楼、角楼和城砖被拆。不少居民在城墙根建房挖窑，造成墙体坍塌。四门瓮城被一些单位和居民占用，地基下沉，墙面裂缝，城楼檐柱脱榫走动。城河淤塞不通，一遇阴雨，城河水漫溢，平时则成了滋生蚊蝇的臭水沟和污染源。这种情形，严重损害了古城的风貌，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和困难。西安城墙已经到了非维修不可的地步。

在与恩师武复兴先生交谈时，得知其父亲武伯纶先生在西安古城墙的保护问题上，曾向习仲勋写信请求勿拆，而起到了特别作用。对此《人民日报》陕西记者站原站长孟西安也有记载，堪为佐证。1982年，孟西安在西安晚报社任记者，曾有幸访问了历史学家、原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兼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武伯纶先生。武伯纶先生不仅满腹经纶，而且是位慈祥的老革命，他早年曾结识习仲勋，关系密切。武老谈西安的历史如数家珍。突然，他谈起了西安城墙，他告诉记者：西安城墙像北京城墙一样，差一点遭到被拆掉的厄运！1958年大跃进时，北京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并发展交通，把明城墙拆除，只留下了几个城楼。西安当时也仿效北京，准备把西安城墙拆除。“当时我急了，西安城墙怎能轻易拆除呢？如果拆除了，西安还能成为古城吗？”武伯纶先生思之再三，连夜疾书，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写信，请求保存西安古城墙，不要拆除（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通过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伯平转交给习仲勋的）。“习仲勋是陕西人，他对陕西和西安的历史是熟悉的，也是很有感情的。”武老兴奋地说：“习仲勋同志接到信后，当即批示，大意是西安城墙是重要的文物古





迹，应当保护，不能拆除。”之后，在习仲勋的支持下，西安城墙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使西安城墙依法得到保护。20年后，我曾问时任西安环城建委主任史凡，史凡说有此事，但当年习仲勋的批示，因文档辗转多年，现在很难找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时任省委书记马文瑞的主持下，西安市委、市政府发动市民义务劳动，对西安城墙和护城河进行修补和清污，在城墙上修复了文昌楼和敌楼，城墙更加完整和雄伟了，护城河也变清了，成为市民休闲和晨练的环城公园。1989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到西安人民大厦采访，碰见省委书记张勃兴。张书记说：“习老春节回陕过年，现在大厦住，要不要一起去看望一下？”我说：“好呀！”就随张书记一起来到大厦习老下榻的房间。当时，习老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仍然是那么平易近人和慈祥，他操着浓郁的秦腔普通话与大家攀谈。他说在西安会见了老战友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及女儿刘力贞等老同志，还问起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秦川、胡绩伟、丁济沧等曾在陕西工作过的老同志。当时，我感激地问习老：“听武伯论说您批示不要拆除西安城墙，有此事吗？您为保护西安城墙可立了大功了！”习老笑着说：“有这么回事。对祖国文物一定要爱护，西安城墙是重点文物，应当保护！”

对此，《陕西日报》也曾有详细报道，不妨摘引如下：

1950年，西安在恢复城市建设时，为了加快工业建设，修理水路，就曾经提出拆除古城墙的计划。当时，由于长期战乱，西安古城墙遭到严重破坏，多处坍塌，城砖被人随意搬走。4月7日，习仲勋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集体办公会议，把拆除城墙问题列为议题。讨论时，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认为当时并没有大的工业建设，仅仅为了修理水路，没有必要拆除城墙，强调指出：“一动就会乱。”大家赞同他的意见，最后形成决定，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随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这一决定，使西安古城墙逃过一劫。

习仲勋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两次指示保护西安古城墙。

第一次是再次制止了对西安古城墙的拆除。

1958年，“大跃进”运动席卷中国大地，狂热的“左”倾冒进之风愈演愈烈。北京的明城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拆除的。这股风也刮到西安，不少人向政府建议拆除西安古城墙。6月中旬，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召集由市委文教部、市政协、文史馆、参事室、文化局、公安局、教育局、房地局、历史博物馆、西北工业设计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城墙拆除问题。在讨论会上，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拆，一种主张保留。“拆除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主要起防卫作用，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国防价值已经不大，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并且城墙古老，缺乏排水设备，遇雨水冲刷，很多地方容易发生危险，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反之，如果将城墙拆除，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以加以利用。此外，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也可以清除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迹着想，只需要把城楼留下来就行了。“保留派”认为西安城墙是闻名的古建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央



规定有300年历史的古迹都应该保留。西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建设并无多大妨碍，保留下来，还可研究和观赏。两派中，拆除的意见占多数。

1958年9月24日，中共西安市委向中共陕西省委报送了拆除西安城墙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党组研究，并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们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10月25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复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原则同意你会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拆除工作应该作出计划，逐步进行。目前首先拆除建设发展需要和有倒塌危险的部分。对城门楼阁应严加保护，不予拆除。”12月25日，西安市人委根据西安市建设局拆除城墙的计划意见书，作出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之后，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南城墙西段外包砖全部被拆走。

拆除西安古城墙，引起了很多人的特别是一些文物工作者和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不满。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先生，陕西省文物工作者王翰章、贺梓城、范绍武、王世昌等5人，即向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们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反映情况，恳请国务院领导予以干预。

1959年春夏之交，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看到来自西安的电报，认为这5位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保留保护西安古城墙意义重大，让办公室致电陕西省和西安市，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此举对保留西安古城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之后，习仲勋又指示文化部研究保护西安古城墙的问题。1959年7月1日，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建议》。建议指出：“据我部了解，在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西安城墙已有部分拆除。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据志书记载：‘隆庆二年巡抚张祉甃以砖’‘崇祯末巡抚孙传庭筑四郭城’。城墙东西长七里余，南北长五里，周二十五里，高三丈四尺，基厚六丈，顶宽三丈，旧有四门，并保存有城楼、箭楼、角楼等。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

1959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9月2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把国务院的通知转发给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希望根据通知精神研究具体办法，对西安城墙妥为保护。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开始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城墙，并于12月28日发布公告：“自即日起严禁拆取城砖、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坏城墙行为。”

1961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古城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次是进一步保护西安古城墙。





1981年11月22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852期刊载了新华社记者卜昭文撰写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一文，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况。文中在列举了西安古城墙遭破坏的情况后，从两个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一、没有把保护文物古迹作为“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如四个城门的瓮城被机关单位和居民长期占用的事，已经喊了十几年，迟迟得不到解决。解放后，国家曾投资数十万元修缮的南城门，被市人防办占用；现在对外宾开放的西门瓮城被市消防队占用，并在瓮城内盖了一座三层楼房，与古建筑风格极不协调。城门洞成了车库，瓮城内有消防车辆的停车场。这里还修建了各种生活和工作用房，瓮城几乎没有空间，而且卫生情况极糟。更为严重的是，消防队修建了与城墙等高的两处烟囱，彩绘一新的城楼，被黑烟日夜熏蚀，变得非常陈旧。到西城门的国内外游客无不惊讶和叹息。西安市人民政府早就作出了搬迁的决定，但占用的状况长期没有改变。二、与管理城墙有关的单位相互扯皮、制约，各行其是，使保护城墙的工作不能落实。环城公园的建设由市园林局负责；环城路的建设由市政建设局负责；护城河的管理由市环保局负责；城墙内侧的违章建筑由市城建局管理；沿城墙的土地所有权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登记。由于没有统一协调的机构，城墙管理所无法管理，上述单位各搞各的，侵占城墙内外的空地。有关部门建议，西安市城墙管理所应该成为一个协调机构，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单位。城墙应由文物部门统一管理。

习仲勋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非常着急，立即让秘书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打电话，让他们查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按照习仲勋的批示，于1981年12月31日形成了《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致函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项措施：一是希望按照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精神，责成西安市人民政府切实做好保管工作。要划出必要的保护范围，竖立保护标志与说明，并且建立科学记录档案，设置专门的文物保管机构。二是应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方案，制定维修保护办法。所有的占用单位要限期迁出。今后城墙的保护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并将保护维修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之中。三是以政府名义公布保护城墙的命令或条例。自命令公布之日起，严禁乱拆城砖，乱挖墙角的破坏行为。如有故犯者，不论大小机关、公私人等，均应依法惩处，为首者应予严惩。1982年1月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以送阅文件下发。1982年8月20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告》。1983年2月，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成立，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1983年以后，按照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和历届省市主要领导的要求，陕西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对西安古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清理了占用瓮城的单位和居民，修复了东门、北门箭楼，补建了南门闸楼、吊桥，并建成环城公园，从而使这座当今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古城墙重放光彩，和护城河、环城公园、环城路四位一体，成为西安一大旅游景观。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的负责人先后两次看望习仲勋，向他汇报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和建设情况。当时西安古城墙除了西安火车站广场处没有修补连接外，其余全部整修完毕。习仲勋非常高兴，要看望他的负责人代他向战斗在一线的文化



工作者问好，鼓励文物工作者继续做好城墙的保护工作。他说，城市的历史要延续下去，应该留下一些历史符号，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空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定要把老祖先留下的东西保护好，不然人家外国人不相信你是文明古国，因为你没有实物。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也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给子孙们留下教育的实物。要把剩下的那些豁口都连起来，不连起来就不算完整，连起来才能叫完整的城墙，再过两百年也是文物嘛！

2004年12月，西安古城墙最后一个豁口即西安火车站广场处通过桥型城墙连接起来，习仲勋的心愿得以实现。

在西安城墙的保护中，西安市原市长张铁民也起了重要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张铁民市长就任西安市市长可以说就任于危难之中，挽狂澜（城墙）于既倒，面临着脏、乱、差的恶劣环境。很多现在的西安人是不知道的，特别是年轻人不可想象的到，1980年代初期的西安，街道上尘土飞扬，风吹垃圾飞，下雨污水流；有人在马路上筛沙子堆土和稀泥，胡乱堆放建筑材料；市区内竟有60多座垃圾山。千年古城的城墙损坏严重，残缺不全。1982年2月22日《陕西日报》刊登了封外宾来信：“你们把这么一个古老的城市管理成这个样子，简直不可思议！”当时，西安是全国第二大旅游城市，也是国家门面城市，如此脏乱差，岂不丢“国脸”？

适逢改革开放的形势，张铁民大声疾呼道：“作为市政府、市长来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在离休之前，把西安整治成一个文明、整洁的城市，使它成为四季常青，春、夏、秋、冬四季鲜花盛开的城市，给全市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休息环境。”张铁民市长说到做到，知行合一，他亲自担任市容卫生整顿指挥部总指挥，发出了先搬掉市内六十多座垃圾山的动员令。

1983年2月24日，由省、市党政主要领导牵头组成的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4月1日，古城墙六百年来第三次大规模的维修、也是西安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文物保护工程，周长40华里的环城公园建设，在礼炮声中拉开了战幕。工程由专业队伍施工和群众义务劳动相结合，按区域划给城郊各区，分段包干。百余万人参加义务劳动的环城建设，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正在城墙西南角的西北大学上大学的笔者也参加了护城河西南角的修复劳动，至今记忆犹新。经过一年多的修复，西安城墙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墙被完整的保存下来，成为中外游人游览西安必去之处，亦成为西安靓丽的名片和最美的风景线。

众志成城，西安城墙的修复离不开千千万万市民的辛勤劳动，离不开城建部门的组织规划，离不开驻陕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大力帮助，以及人民艺术家袁恩凤和各界的慰问鼓励，但习仲勋、武伯伦、马文瑞和张铁民的鼎力支持和护佑却起到挽城墙之既倒的至关重要作用，堪称西安城墙的保护神，可谓功莫大焉！

2023年2月12日于上林苑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组织部）





关学研究的新境界

——读《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

史飞翔

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化的兴起，“关学”也由一门鲜为人知的冷僻学问变得炙手可热起来。记得2012年笔者写《关学与陕西书院》一书时，绝大多数人连“关学”是什么都不知道。短短几年，有关“关学”的各种文献、书籍不断出版，各类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 and 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股“关学热”席卷三秦大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政府层面的大力倡导、学界众多学者的广泛参与和深入研究、媒体的推波助澜、民间的实践推动和积极配合。面向公众推广和普及“关学”当然是好事。但常识告诉我们，人文领域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太热，对学问来讲都不是什么好事。说实话，对于时下兴起的这股“关学热”，笔者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担忧。笔者认为时下的“关学热”，有点像前些年的“国学热”“终南隐士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热”，就像中医里面讲的“上火”。目前业已展开的各类关学研究要么是“经院式”的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要么是民间“书院式”的一哄而上，杂乱无章，总之缺乏一种相对客观和冷静的理性态度，缺乏一种耐心而又系统的学术评判和价值引导。庆幸的是，人群中总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寂寞的存在着，用

他们超人的智慧、坚韧的毅力与淑世情怀，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耕耘在学术的园地，阐释并守护着这个世界。日前，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从学术源头上对关学进行了盘点、厘清，起到了“正本清源”和“明学术、正人心”的作用。

《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由著名文史专家、长安学创始人李炳武先生策划、总主编，“中国关学研究第一人”陈俊民先生潜心十余年整理校点、荟萃关学学术精髓，从哲学史、思想史以及地域文化的角度对时下兴起的这股“关学热”给出了专业的学术引领和令人欣慰的专门回应。阅读这套书，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起例发凡、含英咀华，它既是陈俊民先生个人四十余年来关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和“检阅”，也是关学研究的一次“集大成”，更是关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全书对关学的诸多重大问题给出了自己精辟而又独到的阐释和澄清，一些领域还填补了研究空白，在方法论上也实现了创新与突破，意义重大，开创了关学研究的新境界。

作为地域文化“长安学”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的《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堪称是一



项繁重而又浩大的学术工程，全书共分9卷12册，包括《导读》《张载卷》《正蒙诠释卷》《蓝田吕氏卷》《吕柟卷》《韩邦奇卷》《冯从吾卷》《李颙卷》《关学人物卷》。《导读卷》是陈俊民先生为《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所写的导读，约20万字。作者首先将关学定位在中国哲学的“宋明理学”范围，从而确立了严格意义上的关学概念，梳理出了关学传承的基本脉络。其次作者分析了张载之后关学发展进程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对重构“关学历史”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从中揭示了张载关学以传承“儒之正学”为方向的优良传统及其真精神。在《导读》部分后作者向读者表明了自己关学独立研究四十余年所坚持的方法论原则及其意义，这是作者毕生关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提炼。《关学人物卷》是陈俊民先生对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海峡两岸曾出版过的《关中三李年谱》和《关学编》的重新校订，并附有《关中文人传》，一展关中在宋元明清七百余年理学之兴盛。全书其余各卷对宋元明清700年间，关学创立、发展到终结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十余位代表性人物留存的经典作品的辑录和点校整理。正如支旭仲先生在《〈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的特色》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书中辑录的关学文献，都是能代表关学核心理念，也能昭示关学变迁传衍的线索和规律的经典作品。名为《关学全书》，信不虚也。”

与此前已出版的其它关学整理文献相比，《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辑录更全、校勘更精。陈俊民先生始终认为关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史料问题。任何扎实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

础之上，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正是基于此，陈俊民先生才苦心孤诣，不遗余力地往返于世界各大图书馆搜求各种关学底本并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为此，他搜罗了国内外有关图书馆的各种版本，选定距离关学经典作品作者在世时间最近、版本内容最全、校勘最精审的底本和校本。例如：《张载卷》作者选取的是宋刻鸣道本、吴坚本和明刻徐本等善本。《吕柟卷》采用的是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嘉靖本”做底本。《冯从吾卷》用的是现存有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明代天启年间冯从吾在世时由其子增刊出版的“天启本”。《蓝田吕氏卷》则是作者历经十多年在国内外有关图书馆亲手从浩繁的文献中搜集、抄录成册，可谓是沙里淘金、集腋成裘。选本的精良，从源头上保证了全书文本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从源头上实现了“溯本求源”。底本重要，校勘更重要。众所周知，点校古籍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因为古籍整理属于文献学范畴，任何一个大家整理古籍，都难免不会出错，这就像“尘埃风叶，随扫随有”，往往是出力不落好，所以鲁迅先生当年才会讲校点估计“往往害得有名学者出丑”。校勘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却是治学之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文本，其它一切都是空谈。从踏入关学研究的第一天起，陈俊民先生就一直有一个宏愿，编纂一套能够传世的《关学全书》，为此他奋斗了大半生，如今他的理想终于实现。此次出版的《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其中《张载卷》特别补入经作者长期辑佚校点整理的“横渠三说”——《论语说》《孟子说》《礼记说》以及《文集辑存》（总计文20篇、诗78首，远远超过中华书局本所收集的文9篇、诗15首），是迄今收集最全、版本最善、编辑合理、校点精审的《张载





全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一书，北宋以后已失传，此次作者花费了十多年时间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有关古籍中搜索、辑佚、校点、编纂而成的学术著作，弥补了张载以后北宋弟子传承横渠学说而缺失文本的空白。《吕柟卷》也是迄今为止最全的吕柟文集。

第二，拨云见日、正本清源。近年来关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目前仍有许多问题存在争议，有待澄清，例如：关学的定义问题，张载的师承问题，张载之后关学是否中断的问题等等。数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先是关学的定义问题，书中让笔者最为欣赏、击节和赞叹的便是陈俊民先生的“关学观”。早在1981年，陈俊民先生便应邀参加了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会上陈俊民先生提交了论文《关学源流辨析》。该文首次厘清了关学的概念，提出“关学不是‘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关中理学’”，这就等于从立论上对关学进行了破题。不仅如此，陈俊民先生还说：“‘关学’是地域文化生态中形成的导学学派及其学说，它始终保持‘以礼立教，变化气质’，‘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儒学传统，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史。”“关学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与诸学派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同时受整个宋明理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发展进程的制约，而且同宋元明清诸朝不同的政治文化生态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所以，只有把关学置于整体的宋明历史与地域文化背景中，并同它相关的诸多领域联系起来思考，才可能获得全面的理解。”将关学置于地域文化生态和哲学史、思想史的学科背景下来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这是陈俊民先生不同于时下那些对关学一知半解，缺乏深入了解，

但却一味鼓吹张载及其“横渠四句教”如何、如何，一味曲意迎合的庸俗学人的冷静和高明之处。要知道很多时候偏见要比无知更可怕。陈俊民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张载关学虽是专题个案研究，但它同哲学史、思想史等专门研究一样，并不单是一种纯哲学的研究，也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它必须从既定的史料出发，必须从某些学界认同的预设或假定开始。不然，大量原始的关学文献仅仅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而无法整理出条理系统，更无从寻找到其思想变迁传衍的线索和规律来。”笔者以为这段话实在是“见道之言”，它不但厘清了关学的定义问题，更重要的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关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症结，真的可谓“拨云见日”。其次，在张载的师承问题上，陈俊民先生也有着自己迥然于众人的独立见解。以往的学者说到张载的师承问题时，总是语焉不详或是有意无意地略过，好像张载的学问是前无来者、后无继承，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在一向重视师承的传统社会，实际上等于是对张载个人及其学问的轻视。针对此，陈俊民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提法——“学承”。陈俊民先生说，为学有“师承”与“学承”两端。“师承”是指学业上亲炙有相当学养的学者，或听其课，或入其室进行学习；而“学承”，则指后学自己通过钻研著名学者的著作而对其学说有所继承、汲取。陈俊民先生在张载的师承问题上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张载的学问来自北宋申颜、侯可创立的“华学”，“华学”与关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认识与陈俊民先生的个人经历有关。陈俊民先生出生于陕西省华阴县（1990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华阴地处河岳之间，华山雄踞其南，黄渭萦绕其北，东据晋



豫，有崤函之险；西去陇蜀，是通衢要冲，素有“关中要塞”“三秦门户”之称，自古为人文荟萃之地，名人辈出：“关西夫子”杨震、文学家杨修、初唐“四杰”之一杨炯、清代学者王宏撰、王宏嘉等。宋代隐士、学问家陈抟，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等都曾在这里潜心研究学问。华阴为申颜、侯可创立“华学”的诞生地。陈俊民先生生于华阴，长于华阴，长期以来饱受“华学”影响，久而久之，遂对“华学”与“关学”之间的联系了然于胸。所以他才得出这样令人不得不服的结论。再就是关于张载之后关学是否中断的问题，那更是制约和束缚关学研究由来已久的“老大难”问题，几乎成为一个人人不敢涉足的“禁区”，谁要敢踏入，实际上谁就等于主动挑起了所谓的“门派之争”。前些年有位大学教授公然在著作中宣称张载之后无关学，真是可笑至极。既然张载死后都已经无关学了，那你还研究它做什么？对于这种荒唐的认识，陈俊民先生在《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中给予了有力地驳斥与回击。陈俊民先生以文本为事实，详细地阐述了张载身后关学的发展、衍化，特别是元明清之际关学的再度中兴，讲了冯从吾、李二曲等人对关学的巨大贡献。作为理学奠基人、关学创始人，张载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占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他“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终为往圣——孔孟继得了“尊儒”“重礼”“务实”的“道统”，也因此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关学。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称作“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赅，历代传颂不衰，流播世界。当代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先生称“横渠四句教”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句”，是中国人的精神DNA。在《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中，陈俊民先生按照张载其学的逻辑进程，依次论证了张载确立“性与天道合一”的关学主题；张载追求“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和“孔颜乐处”的自由人格；张载以“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结构原则，构成了“气——道——性——心——诚”的哲学逻辑范畴体系等诸多学术问题，对关学的宏观研究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关于张载和关学笔者曾当面请教过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刘先生斩钉截铁地指出，张载学说直承孟子，是鸿蒙正学。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第三，方法论上的创新与突破。陈俊民先生在《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第一卷即开宗明义地写道：“如果说，我在这一世的孜孜求索中还有点真实的学术体悟的话，那就是我常给我的博士生所说的‘欲求创新，必先传承；学贵探索，更贵自得。’我的整体研究工作，是从整理古籍入手，同时进入‘关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之中。也就是说，先对估计所载之传统思想原本的‘传承’，然后简择出‘精华读本’进行现代诠释，其中有探索，有突破”，这便形成了我独具一格的“目的之学。”笔者认为陈俊民先生的“目的之学”有两大支撑，问题意识与基本假设。《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在整理缕析关学典籍的基础上，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和方法，着重探讨了宋明理学思潮中关学学派的形成、发展和终结的历史过程，主要剖析了关学领袖张载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思辨逻辑，以求把握关学学派思想的显著特征及其与整个理学思潮发展的共同趋向。

第四，现实关怀。陈俊民先生虽然主要





从事的是古代哲学研究和古籍校勘，但他不拘古，不泥古，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代意识，纸上风云，笔下生情。陈俊民先生研究关学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着眼于现实，目的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张载的“四为”精神在新时代落地生根、发扬光大，为关学的重振与复兴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实践之路。陈俊民先生六十岁时曾借用郑板桥的诗句将他的治学经验概括成四句话：“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爱（要）钱，步前贤之后尘，走自得之路径。”（《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自序》）前两句说的是自己学术研究的范围（儒佛道）与宗旨；后两句说的是自己的学术师承、学承与自得。这几句话既表达了陈俊民先生的学术研究实际，同时也是他毕生的学术理想追求。

概而言之，《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的

出版意义重大。它不仅为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打造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对弘扬陕西地域文化、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资鉴作用。仅从学术的角度而言，《长安学丛书·关学全书》的出版和发行也是陕西思想文化成果的一次集中整合，是抢救和保存中国传统思想学术重要流派“关学”的经典论著，是关学研究的一次“集大成”，是关学史上的一次创新与突破，将关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开创了关学研究的新境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终南文化》杂志编辑部主任。）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山史籍

玉树临风

解释：形容人像玉树一样十分潇洒，秀美多姿(多指男子)。

出处：唐代杜甫《饮中八仙歌》：“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故事：《饮中八仙歌》是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此诗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八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用追叙的方式，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作者写八人醉态各有特点，纯用漫画素描的手法，写他们的平生醉趣，充分表现了他们嗜酒如命、放浪不羁的性格，生动地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崔宗之，本名崔成辅，字宗之，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历左司郎中、侍御史，谪官金陵。与李白诗酒唱和，常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



论地方志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原则^①

南剑飞

摘要：进入新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重视和做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及表现形式之一的地方志文化事业。论文强调了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意义，阐述了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原则包括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等，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科学推进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工作、全面推动我国地方志事业更好地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所贡献。

关键词：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

^①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作用与在全面建设生活中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价值。

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记述形式，在记录阐释、保护挖掘、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作用独特。进入新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重视和做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及表现形式之一的地方志文化事业。正所谓：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地方志系统内外所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新时代方志文化人坚定文化自信、展示文化自信、体现文化担当的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与光荣使命及自觉担当。这是由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重要载体和纵贯古今、横陈百科的地方志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即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价值决定的，包括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特别是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落实好《关于在全国地方志系统开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的通知》（中指办字〔2022〕41号）的现实需要。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改革创新是当今时代精神的核心……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就要停止……无疑，创新也是新时代地方志系统完成转型升级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图。当前，一本书主义（志书）、两本书主义（志书和年鉴）的固有思维及行为依然存在于地方志系统，这不仅影响了地方志文化事业转型升级进度，也削弱了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因此，迫切需要创新。

二、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原则

（一）观念创新

时代是思想之母，观念是行动统帅。如果观念僵化、思想守旧，那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重大任务，交给观念僵化、思想守旧的传统的地方志工作者，难免会在实践中动摇不定，也恐难确保其行稳、致远。因此，观念创新至关重要。鉴于当前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出现的问题、短板及弊端，故，需要新时代方志人务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且牢牢树立以下三大新观念即新时代的地方志定位已不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更多的是一项事业；新时代的地方志已不再仅仅是一本书主义，而是一项涉及四架马车齐驱、



十业并举的系统工程；新时代的地方志工作者已不再仅仅是职业人，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引领者、践行者、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等五位一体的新时代地方志文化代言人。正如习近平指出：修志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只有当方志人完成其文化人的角色转变后，这才意味着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更流畅、行动更自觉、方式更灵活、效果更理想。因此，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要任务就是要树立创新观念。针对现有短板，地方志系统当务之急是需要牢固树立用、活、立、强四大新观念。只有用起来、活起来，地方志才能立起来、强起来，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传承弘扬。

（二）内容创新

观念创新只是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前提条件，内容创新才是根本和关键。因此，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内容创新。同时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求：地方志系统，内容创新务必从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这个新坐标出发，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自觉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容创新，务必以人民为中心，务必更好地服务人民，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新时代地方志文化人务必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和人民需要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结合地方志事业发展实际，这里的内容创新，主要涉及：方志产品创新，包括志、鉴、史、刊；方志服务创新，包括馆、网、库、研、会、用等；方志人才创新、方志管理创新。上述前两类创新，可以整合起来，称之为：主业创新，这是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内容创新，主要的着力点，例如让旧志走进新时代教育年轻人，让改革开放后的新志更有时代气息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人走进现代多功能方志馆，让更多的人浏览中国地情网、开发利用地方志申报各类遗产，精编更符合新时代老百姓口味和需求的地情普及读物等。例如，成都市方志办积极适应当今社会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注重将厚书变薄书，将文雅变通俗，按照选材精粹、内容精彩、史实精准、语言精练的标准，编纂出版《成都精览》，以“口袋书”形式，系统、权威、通俗介绍成都4500多年历史和人文知识，让读者“一册在手，尽览成都几千年人文精华”。该书荣获成都市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被四川省委全面深化改革会议发给全体与会代表，被成都市人大、市政协作为礼品书对外交流使用；被成都市教育局指定为中小学乡土教材、进入全市1100多所学校，列入成都大学培养“成都通”人才的教材；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将该书纳入全国“农家书屋”重点书目，面向农村文化馆、图书馆发放。现该书已印发2万余套，拟推出电子书，出版繁体版和英文版，面向世界发行。在此方面，理论与实践创新齐头并进的福建经验，值得借鉴。

（三）形式创新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有内容，必有为内容服务的形式。同样，有内容创新，就必





然存在形式创新。针对地方志系统而言，特别是在地方志文化事业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地方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需要关注形式创新，包括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手段提升地方志开发利用的信息化、数字化水平。例如可推出地方志微视频上线。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认真贯彻上海打响“四大品牌”的战略部署，积极打造地方志文化品牌，经半年筹划，2018年5月下旬正式推出了“方志上海微视频系列”（第一辑：船的城市）。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利用影像技术，为地方志这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与传承搭建新的平台，利用微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以更加现代化、信息化、流行化的直观效果，促进上海地方志的普及和推广，打响地方志文化品牌，传承上海优秀历史文化。“船的城市”微视频是“方志上海微视频系列”的第一辑，主要通过地方志的记载，以影像形式展现船与上海老百姓的生活、休闲、出国和工作等的密切关系，回顾元初上海的沙船被列为中国四大名舟、上海被誉为“沙船之乡”等，告诉人们：“这就是地方志告诉我们的故事，地方志记载你我身边的历史”。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将选择系列主题，通过系列故事，继续精心打造“方志上海微视频系列”。又如尝试志书音频化。成都市方志办以《成都市志·民俗方言志》为试点，制作方志有声读物，现已制作完成音频化条目407条，每个条目时长2~3分钟，以说、唱等形式，体现原汁原味的成都民俗特色。在成都市部分大学、图书馆、车站、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播放后，受到社会公众好评，现直接打开我办门户网站即可试听，尝试了从“看志”到“听志”的转变，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便捷、周到的读志用志服务包括创新开发志书APP。成都市方志办已经实施的“数字方志馆”二期项目，专门开发了志书APP。该项目已于2018年5月建成，面向社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可移动的服务，受众可通过手机终端随时随地在线浏览查阅最全面、最权威的成都地方志文献和影像、影音资料。形式创新，关键要走心即需要最好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的方式展开。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12月，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的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陕西故事”调讲决赛在陕西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调讲决赛演讲内容包括《关学宗师张载》《李德现的公路梦》《马锡五调解纠纷》《同朝皮影戏》《蝶神周尧》等22个故事，涵盖方志故事、历史故事、红色故事、文化遗产故事、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事等5种类型，形式活泼，感情真挚，催人奋进。参赛选手通过演讲，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展示了全省修志战线同心同德、砥砺奋进、共筑中国梦的生动实践，彰显了陕西地域文化特色，凝聚了陕西力量，传播了陕西声音，弘扬了社会正能量，发挥了地方志以文化人、以志资政的社会功能，同时也为方志人追赶超越凝聚了精神力量。需要指出的是：方志形式创新或创新方志表现形式，福建的做法，可圈可点，值得学习和借鉴。比如，福建省方志系统在全国首开用文艺晚会形式表现地方志的先河，真正让方志典籍“活”起来；福建省方志系统在全国率先启动名镇名村影像志拍摄工作，真正让地方志“立”起来、“热”起来，使方志文化真正走进百姓、走向世界。





一心为公的辅佐者——

周公

周公，姬姓，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史籍中亦常称为周公旦。周公一生经历了西周的文王、武王和成王三个时期，这正是周国逐渐壮大，起兵灭商，进而统治全国的强盛时期，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时期。

周公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大政治家，也是古代最杰出的法律家之一。他创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典章制度，对于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总结前代的成果，适应西周时期的社会需要，提出了以宗法伦理原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标志着我国奴隶主阶级的学术理论水平，并成为后来的先秦儒家学说的思想渊源；他的“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在当时的世界法律思想发展中居于领先地位，对于后代的司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同时，他的业绩、学识、以至人格，在后世都受人景仰，得到极高的赞誉。其在中国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周公曾辅佐武王伐纣。既克商，封于曲阜

为鲁公，未就，留佐武王。继立的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不服，联合纣子武庚及东方夷族徐、奄、薄姑等部起兵反叛。他亲率大军东征，首先诛灭武庚，杀死管叔，流放蔡叔，消除了叛乱中心势力；再经三年苦战，相继平定东方诸国。至此，周灭商的事业才告完成。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他大规模分封诸侯，作为王室的屏藩；又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东）为东都，从而建立了西起岐阳东到圃田，由当时最富庶的渭、泾、河、洛地带构成的周王畿地区，作为控制全国的基地。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其言论见于《尚书》的《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国人暴动”发生，周厉王出奔后，他与召公二相行政，号称“共和”。后太子靖即位为宣王，周公与召公又共同辅佐之。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表达了周公对周王的忠心。《史记·鲁周公世家》记：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於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则体现了周公在周王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西汉廉吏——

赵广汉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今河北保定）人，蠡吾以前属于河间郡。赵广汉年轻时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达、才识敏捷、礼贤下士闻名。经考核为阳翟县令。因为治行优异，调升为京辅都尉，守京兆尹。恰逢昭帝去世，新丰人杜建做京兆掾。杜建一向豪侠，宾客为奸利，赵广汉闻知此事，先婉言劝告。杜建不改，于是收捕法办。许多中朝贵人和地方豪强为他多方说情，赵广汉终无所听。杜家宗族和宾客策划劫狱救杜建。赵广汉完全掌握了他们的计谋和主谋的举止动向，于是派



部下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计划这样做，将一并灭除你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赵广汉命令几个官吏将杜建押到街市斩首，没有人敢靠近，得到京城人的称赞。

后来赵广汉升颍川太守。郡中大族原氏、褚氏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任二千石不能擒制。赵广汉到任几个月后，杀掉原氏、褚氏首恶，郡中震栗。先前，颍川豪杰大姓互相结为婚姻，官吏结为朋党。赵广汉忧虑此事，于是想了一个办法，选择其中可使用的让他们办案。案发已得罪名的，依法惩处。在此过程中，赵广汉还故意泄露他们的供词，使他们互相怨咎。又教下属设密告箱筒，得到检举书后，去掉告密人的姓名，而假托是豪杰大族子弟所告言。采取这样的方法后，当地的强宗大族互相结为了冤家对头，于是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官吏、人民互相告发揭露，赵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因此不敢作案。这些权宜之计使诸事皆得治理，赵广汉威名流传，甚至匈奴投降的人说在匈奴都闻知其威名。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派出五位将军攻击匈奴，征调赵广汉以太守的身份带兵，隶属蒲类将军赵充国。随军队回来后，又再次代理京兆尹。满一年后，正式担任京兆尹。

赵广汉虽然身为二千石官员，但他和颜待人接物，对待部属尉吏殷勤备至。事功推善，归之于下，说：“这是某掾卿所做，不是我太守所能做到的。”这些行动出于至诚之心。属吏见到他都能倾诉自己的心腹之言，没有任何隐藏的，都愿意被他驱使，再累也不躲避。赵广汉耳聪目明，属吏的能力、适合做的事，及办事尽力与否，他都知道。对于有问题的属吏，总是先打招呼，劝说不改，才收捕他，无一逃脱。





赵广汉为人刚强有毅力，精于吏职。同其他官吏及百姓见面，有时候可以通宵不寐直到天亮。他尤其善用钩距的方法来弄清楚事情的真相。钩距的方法是这样：如果想知道马的价钱，就先问狗的价钱，接着问羊的价钱，牛的价钱，最后再问马的价钱，反复比较、检验这些价钱，按照事物种类不同加以度量，这样就可以知道马价的高低，基本不会偏离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只有赵广汉能够运用得很精妙，其他仿效者都比不上他。赵广汉对郡中里巷盗贼和行为不轨者的藏身匿居之所，对其他官吏即使轻微的受贿行为，全都了解。有一次，几个年轻人在长安城偏僻的巷子中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屋里会面，商量一起抢劫，坐下来还没说完，赵广汉派的吏员就到了，逮捕了他们，后经审讯，那伙人全部承认犯罪事实。

起初，大将军霍光秉政，赵广汉事奉霍光。等到霍光死后，赵广汉心知天子未言明的心意，于是发动长安属吏，亲自带领，一起到霍光的儿子陆侯霍禹家，直闯入其门，搜索私屠私酤的罪证，打烂酒垆酒坛，用斧头砍破门而后离去。当时，霍光的女儿为皇后，听说此事，对皇帝哭泣。皇帝内心赞许此事，召问赵广汉。赵广汉由此侵犯贵戚大臣。他的官府好用世代为吏的子孙中新晋的年轻人，特别鼓励他们的强壮锋锐之气，见事风行，无所回避，大多果断决计，没有迟疑的。赵广汉最终因此身败。

赵广汉虽然因犯法而被杀，但是因为任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各得其所，百姓追思、歌颂。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出史籍

沧海桑田

解释：沧海，指大海。桑田，植桑之田，指陆地。指大海变为陆地，陆地沦为大海。形容世事变化巨大，比喻世事变迁，人生无常。

出处：东晋·葛洪《神仙传·麻姑》：“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

故事：从前有两个仙人，一个叫王远（字方平），一个叫麻姑。一次，他们相约饮酒。席间，麻姑对王远说：“自从得道接受天命以来，我已经亲眼见到东海三次变成桑田。刚才到蓬莱仙山去巡视时，又看到海水比前一时期浅了一半，难道它又要变成陆地了吗？”王远叹息道：“是啊，圣人们都说，大海的水在下降，一旦变成陆地后，行经东海，又要满是飞扬的尘土了。”宴饮完毕，王远、麻姑各自召来车驾，升天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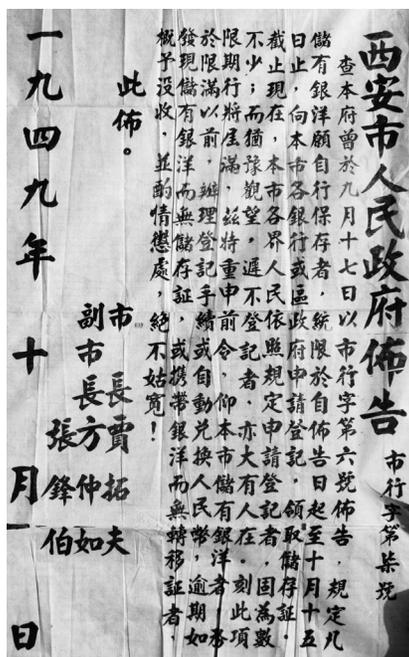
西安市第一届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长——

张锋伯

张锋伯（1900~1985）原名连颖，字颖初，一名李然。西安长安区大吉村人。幼时在当地私塾读书，在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和天津南开中学读完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回陕。1929~1933年，先后在陕西省立师范学校、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第一中学任教师、校长。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中，以陕西省一中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游行示威，发表演说，声援北京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的张锋伯两次带领学生奔赴抗日前线慰劳战士、救护伤员，发起成立“青年之友社”，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塘沽协定》签定后，他率先发动进步学生抗议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因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毅然辞职，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察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回陕任省立一中校长。1934~1935年任冯玉祥机要秘书，多次代表冯赴各地做联络工作。

1936年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在第三战区和第六战区担任军法处处长、战地党政指导委员会上校指导员、第四集团军参议等，数赴抗日前线并利用关系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冬任长安、盩厔（今周至县）、郿县（今郿区）3县督导员，1938年3月至1939年7月任临潼县县长，1942年下半年至1945年初任长安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其间积极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打击恶霸和反动势力，有“模范县长”之誉，并

以动员组织两批热血青年赴延安参加革命，被当局撤职和逮捕，后经友人保释出狱。1946年奉组织指示，经杜斌丞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翌年任民盟



1949年10月1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银洋登记领取储存证的布告

西安市首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1月赴延安学习，12月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至来年3月回陕。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任西安市第二副市长，之后长期担任副市长兼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市文教委员会主任、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和市体委主任，西安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主任，为中共西安市委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和民盟西安市主任委员，第三、四届民盟中央委员。1985年1月在西安病逝。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阳宫祖庵碑林

祖庵碑林亦称祖庵石刻，位于鄠邑城区正西10公里祖庵重阳宫内。重阳宫始建年代约在金大定十年（1170）至承安五年（1200）之间，为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早年修道及葬骨之地。重阳宫曾数次易名，在马丹阳真人等归葬王重阳于刘蒋^①后，建出道宫。金承安四年（1199），改称“灵虚观”。元太宗十年（1238），改“灵虚观”为“重阳宫”。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将“重阳宫”封为“重阳万寿宫”。重阳宫是中国道教文化十大旅游胜地之一，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享有“天下祖庭”和“全真圣地”的盛名。



王重阳（1113~1170），名嘉，字知明，一字得成，号重阳子，陕西咸阳大魏村人。早年在户县（今鄠邑区）刘蒋村修道，常云游终南山一带。后往山东传道，广收弟子，影响颇大，为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主张儒、道、佛三教合流，提倡“全神练气”“出家修真”，被元世祖封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著有《重阳全真集》《立教十五论》等。大定十年（1170）卒于汴梁，归葬于此。墓地面积约150平方米，于1968年被夷平。曾暴露砖室墓，出土石棺1具，内置木刻重阳像，木像腹腔内装有干骨。同时出方砖两块，上刻“重阳祖师压骨在此”八字，后佚。

重阳宫全盛时宫殿范围北临渭河，南抵终南山，有成道宫、重阳宫、玉皇宫、北极宫等殿宇建筑物5048间，常住道士万余人，护卫士兵3500人。民国时，建筑中轴线上南起仍有灵官殿、祖师殿、老君殿、玉皇殿等房屋。现仅存祖师殿、灵官殿两座古建筑。重阳宫碑林主要以保存元代及明清两代石刻而著称，原存历代碑石大都露天散于村野原重阳宫遗址。1962年，陕西省政府拨专款集中散落碑石，立于原玉皇殿旧址；1973年，建碑房11

①刘蒋，据传在宋代时期，在今地祖庵镇已形成较大村落，因刘蒋两姓居多，故当时称刘蒋村，后改称双溪镇。金正隆年间，王重阳在此筑穴建庵修道，创立全真教。后其弟子马丹阳、丘处机于此重建祖师之庵，双溪镇亦改称祖庵镇，迄今已800余年。

间，建成祖庵重阳宫碑林；1986年，迁移位于马村的清阳宫、元马店、祖庵镇等地石刻集中至重阳宫保护；1991年，于碑林前建成东西石刻廊房12间。

祖庵碑林，现收集陈列石刻文物80余通(件)，其中碑石40余通，元碑居多，大多数为螭首龟趺或方趺，通高5~6米，具有元代形体高大、气势雄伟、龙首龟座、形象逼真的显著特征，如此集中大量元代石刻文献，在国内尚属罕见。此外有少量金代及明清碑石，碑石尤以31通巨型元碑最为著名。经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一级文物12通，二级文物10通，三级文物4通。这些碑石记载着道教全真派的历史、教义、修炼要旨等。据传，祖庵民间一直留传重阳宫内有72通蛟龙碑，但实际现存数量与民间流传尚有差距，可能已被损毁或尚未发现。

按照内容分类，祖庵碑林可分为宗教历史类、书法名碑类、八思巴文类、内丹功法类四种。如《大元敕藏御服之碑》《皇元孙真人道行碑》为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书体圆润秀丽，为书法爱好者所倾倒，是我国书法名碑；《无梦会》《全真教祖碑》《马真人道行碑》等，则为王重阳、尹志平、李道谦等高道的墨宝，均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皇帝玺书碑》等5通蒙汉文对照碑，碑文为八思巴蒙古字^①与汉字合刻，对于研究元代文献译名的还原及演变，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古代蒙古语言的研究也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全国已发现的20余通八思巴蒙文字碑，祖庵碑林即存有5通，更显弥足珍贵。其不仅形体高大、制作精美，且多为皇帝玺书，足见重阳宫在当时社会显贵地位和元代皇帝对道教全真教的极尽尊崇。祖庵碑林的碑铭比较详尽地反映了重阳宫和道教全真派发展起落轨迹和状况，较为集中地反映出全真教与金、元社会政治发展的紧密关系。所记载的全真教修炼方法，对于研究道教文化和我国传统医药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健身养生研究和元代道教发展史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碑石还提供了大量有关宫观经济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祖庵碑林集中保存的金石文献遗存，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2001年6月，重阳宫祖庵碑林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①八思巴古字，元世祖时期，结合蒙、藏、汉等多种文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出的一种新文字，现早已失传。





西安境内的秦岭七十二峪——涝峪



涝峪，位于西安市鄠邑区城区西南约25公里处的秦岭北麓，东邻栗峪，西接甘峪。峪口位于涝峪旅游区涝峪口村，距西安约60公里，距环山路约1公里。

峪谷南北走向，深约50公里，总面积321平方公里，森林覆盖面积5000余公顷，是目前鄠邑区境内最大的峪谷，西汉高速便由此沿涝峪穿越秦岭。从涝峪流出的河称为涝河，古时称为潦水，河水出峪口后于环山路以北约300米处形成湖泊，成为网红打卡地天桥湖，最终一路向北奔波直至汇入渭河。围绕涝峪地区而存在的涝峪镇，于2002年9月撤销镇改为涝峪旅游区管委会，辖区内现有8个行政村，41个村民小组，3800余人，因峪内有知名4A级景区——朱雀国家森林公园，而使涝峪在鄠邑区境内众多峪口中脱颖而出、广为人知。

涝峪峪口有土门、潭庙等地域水流山石之美景。峪内则地理形态复杂，自然景观众多，奇山秀水美不胜收，峪道

开阔深长，九曲十弯。从峪口至古教场为浅山段，峪谷下切深、落差大，水急山险，山峰岭梁峻险高大。从教场至两涝为涝峪的中山段，山回路转，河道平缓，重峦叠嶂，山岭连绵不断。教场以唐朝大将殷开山练兵而称其名，足见其阔。从涝河往上分东涝峪河和西涝峪河，东西涝峪并行而至秦岭正脊，为涝峪深山段。

东涝峪河发源于冰晶顶附近，峪内有朱雀国家森林公园、沙窝子、黑山岔等自然风光。而地处深山、毗邻秦岭主脊的八里坪，其开阔美景让人流连忘返；西涝峪河发源于宁陕、周



冰晶顶



至、鄂邑交界之地，老户菜路沿西涝峪通往宁陕菜子坪、新场、母子坪等地。峪内有西河村、桦树坪、桃园沟、母子坪、凤凰山、天池梁等自然景观和村落，西河村与东侧八里坪隔山相望，为涝峪最南端村落，西河村以上山地，人迹罕至，属秦岭主脊。过去西涝峪是通往田峪四十里大峡谷的重要路径之一，现在已鲜为人知，人车通行甚少。另据勘察和论证，涝峪内尚有圣境山仙人洞、对角岔、黑山岔瀑布、十寨沟古堡、碾盘沟溶洞、大庄坪晚清江南移民旧址、桃园子龙脖子奇险景区等属待开发区域。



朱雀国家森林公园

在峪中流水丰盛期，总会出现多个蔚为壮观的瀑布景观，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黑山岔瀑布就是其中之一。黑山岔瀑布位于峪内沙窝子村，落差达百米，丰水期宽3米，平水期1米，瀑布凌空飞下喷珠溅玉，烟雨空蒙，仰望头顶悬崖，陡如刀劈斧削，瀑布前常挂彩虹，绚丽夺目令人神往。时至冬日，流水会冻结成一道罕见的瀑布冰，沿着冰柱还有不大的水流直落下来，在底部冻结形成一个巨大的冰堆，约百米宽的悬崖巨石上，渗出的水珠形成一个又一个小的冰柱，连成一片，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令人难以忘怀。

相较于闻名遐迩的四川九寨沟，峪中十寨沟则可能较少有人听说过。十寨沟位于峪内郭清村，又称“北方九寨沟”，深约9公里，属于涝峪内的一个分支峪口。至于名称由来，据传在民国时期，村民为躲避战乱和防止匪患，就在自己居住的山顶上建造了13个山寨，故此取名十寨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合并

村庄，遂改为郭清村，因为景色宜人且独具特色，当地人员为发展旅游业，于是又叫回十寨沟，但目前还是属于未被开发状态。十寨沟内植被茂密，绿树成荫，幽静清凉，溪水潺潺，小潭小瀑众多，沟内最有名的是仙人台石柱和大瀑布，还有一个裸露的树根，毫不逊色于贵州陡坡塘美女榕。

此外，在东涝峪河上游朱雀国家森林公园内尚有鄂邑境内最高峰——冰晶顶，又名静峪脑，为第四季冰川遗迹，其位于峪内最高处“冰河翠景区”与太平森林公园交界处，东接跑马梁，西邻涝峪，南抵营盘沟，北挨太平峪，四周群山连绵，人迹罕至，海拔3015.1米，为太白山以东秦岭最高峰、秦岭第四高峰。正因冰晶顶海拔高，气温低，加之远离聚落、山风冷峭、人类活动少，因而平均温度远低于城市，每年11月中下旬至次年4月上旬，山顶积雪不化，阴坡的雪可以保存至四月中下旬。同时，在冰晶顶山顶还有大面积石海、箭竹林、冷杉林、高山草甸相互混杂，其中以石海和针叶林为主，这里也是众多游客必到景点之一，更是众多驴友穿越秦岭经典路线冰晶顶——桦林湾——太平峪必经之地。





逗社火

每小平

社火起源于火，发展壮大于社，是人们对土地与火的崇拜方式，是中华民族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喜庆闹新春娱乐最为热闹活动。

过新年，穿新衣；吃肉菜，饮美酒。初五待客已过，图高兴爱热闹而不安分的少数人，就蠢蠢欲动起来，开始“烧腾”（酝酿）了，三五人私下商议，今年要不“耍社火？”“耍！”众人意见一致，就去先找村组干部，提出“耍社火”的诸多理由和请求；若不同意，就采取“逗社火”的办法来达到“耍社火”的目的。

农民有三乐，唱戏祈水耍社火。“逗社火”的人一般都是些敢想敢干、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过年吃好的、喝好的，尤其是三五相邀喝酒后，烧腾得睡不着，就组织数人反穿皮袄（衣服），打起灯笼（火把）、敲着锣鼓、走街串巷、狂呼乱叫；其它村庄的同类人，也从库房取出锣鼓家伙迎接、戏闹、联合起来“逗社火”。

“逗社火”有让村干部和群众同意支持的意思，还有使邻村干部和群众同意“耍社火”！初始是叫上一帮人，在傍晚敲锣打鼓，使对方心神不安，刺激对方。采用倒骑毛驴，拉牛犁其街巷让“牛社火”助阵，打着火把到街巷十字等处大喊大叫……数法齐上，连续闹腾，一群爱好者跟随其后，摇旗呐喊。也有先抬一桌装扮的“三娘教子”或“姜子牙钓鱼”“诸葛亮征南蛮”“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金沙滩”“包公杀侄”等含有挑衅、挑逗性的社火。此举称“打过家鼓”、也叫“逗社火”。敲着锣鼓打着灯笼，到村干部或邻村干部家门前转游逗一阵；改天重抬一桌装扮的“罗成叫阵”或“辕门斩子”“秦怀玉杀四门”，敲着节奏不整的锣鼓到村干部或邻村干部家门前转游再逗上一火。如若不成，改天再继续“逗社火”！村组干部一般不敢得罪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他们有能力、敢作为、敢于硬碰硬。

一般情况下，打退堂鼓的少，害怕“逗社火”的再来挑衅羞辱……因诸多原因村庄耍不成社火，就抬上“包公赔情”等二三桌或四五桌平台社火，逆时针方向在被逗的村子转一下，为欢乐的春节画上句号。

逗起社火后，两个或相邻的三、四个村堡就约定日子“正社火”。一般都在过年的正月十五左右，也有在二月或三月的春季举行。“耍社火”的信息很快在周边乡镇、区县传开，并张贴耍社火的“布告”，说明那些村堡参加，社火的内容、时间和地点等信息。

“逗社火”成功后，村组干部需向乡镇汇报并得到同意支持。村庄先决定成立“社火局”或“指挥部”，决定大耍日期和人员组成。多由村组干部、乡贤和威信高、爱热闹、能力强、有经济实力的人搭班子（社火头），或叫“总指挥”“副总指挥”“指挥”等机



构职务，在耍社火期间一切事情由“社火头”决定并安排。摊场大的有“总社火局”，下辖“社火局”。一般由3~4社、多的有5~8社或更多的村组，甚至还有外地来助兴的“客社火”。“社火头”虽是临时露水官，但在“耍社火”期间能一言九鼎，令出法随；凡不听从号令者，是要付出代价的。诸事安排，财务来源支出、技术、宣传、外事、治安、车辆、戏衣布景、芯子高跷器械等事项，落实专人，各负其责、各执其事。

耍社火是要出钱出力的，出力家家户户都有青壮年，还有装扮社火的孩童，打旗举牌仪仗队的姑娘娃、秧歌队的年轻妇女、锣鼓队的精壮小伙子、踩高跷（柳木腿）的机灵青壮年、招呼高竿芯子的人……出钱过去是地主、富农等财东家，穷人出劳力。如今是家家出钱、户户捐款；村集体拿出一部分；村庄有实体的企业家、经理、董事长和在外干事等人拿得多，一般人拿的少。

锣鼓前导，仪仗森严；步伐整齐，彩旗招展。乡村街巷人挤满，公路街道都占完；锣鼓能把地摇动，芯子高悬戳破天。“社火出来咧！”“好多好大的社火队伍！”每当听到阵阵紧张热烈、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彩旗飘飘的旗阵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人们就热血沸腾，身不由己去观看……背插五彩旗的“马牌子”手持七彩棍出来开道打场子，“大头娃”憨态可掬左右摇晃，手持绣球“舞狮子”的上下前后扑腾跳跃，“跑旱船”男女的惟妙惟肖表演，“媒婆子”的滑稽动作……最好看的是气吞山河、声震云天的锣鼓队；数十桌的社火方阵、一字排开近百米；芯子入云端，奇精妙高险；高跷高险狂，弯曲独腿趟；美嘟嘟小伙抬大桌，浑身冒汗苦累不说。亲戚朋友争相看，没有待客少有怨。

弘扬传统文化，社火题材多根据秦腔剧目和时代变迁而表现。如《三滴血》《火焰驹》《铡美案》《周仁回府》《人面桃花》《天女散花》《黛玉葬花》《花亭相会》《鹊桥会》《三打白骨精》《花木兰》《劈山救母》《封神演义》《岳家将》《杨门女将》《血泪仇》《导弹上天》《神舟飞船》《神九奔天》《嫦娥奔月》等……

社火一般情况下连耍三天，前两天叫“小耍”，第三天叫“大耍”或“正社火”。越往后越精彩，越往后越热闹，各社火局皆采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竭尽所能，各领风骚。芯子一天一变，铁匠师傅根据要求昼夜打造，确保芯子社火出场。兴奋的人们就魂不附体，思量着那里在耍社火！哪里有热闹！社火是民间流传数千年的艺术，表演以街巷、公路、广场、麦田等为舞台，将人物、动物和科技等进行戏剧化、艺术化融合创新，以达到弘扬正能量，鞭挞丑恶形象的视觉艺术效果。

“耍社火”能凝聚人心，增强团结、鼓足干劲，共同走富裕路。社火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扎根于生活、来自于民间，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耍社火是文化，需要大发扬。社火表达了党的富民政策、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也是春节期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通过“耍社火”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等美好愿望。

要想“耍社火”，先要“逗社火”，才能“看社火”！

（作者系长安区作家协会理事、省散文学会会员、省唐诗与杜甫研究会理事。）



·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

民间竹扎技艺



竹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之前，殷商时期陶器上已然出现竹藤纹样修饰，春秋战国时代竹编工艺蓬勃发展。时至今日，竹子竹藤制品仍未远离大众生活，依旧与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然而，竹扎技艺作为一种特别工艺却鲜为人知。

据记载，竹扎技艺可追溯至宋代，是一种融合木工榫卯和竹子弯曲工艺的竹扎技法。河南巩义市的和义沟经家是竹扎技艺的主要传承家族。宋朝时经家用竹子编制竹筐、竹笼等补贴家用。随着历史演变，人们对鸟虫的爱戴热潮加剧，经家第十四代传人在竹编生活用具基础上，又将竹编发展成玩具类的竹扎技艺，如蝈蝈笼（蚂蚱笼）、鸟笼等笼器。1930年，经家第十五代传人经瑞章因生活所迫迁移西安，在竹筴市用空心毛竹编制竹筐、竹笼、箴篱、筛子等生活用具，换回生活必需品养家糊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瑞章成为木工，闲暇时继续传承竹扎技艺。

经金山，经家第十六代传人，民间竹扎技艺非遗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自幼师从其父学竹扎、木工技艺。他将竹扎技艺加以发展改进，将榫卯连接技术和竹扎弯曲技术相结合，制作出的古代亭台楼阁、人物、动物、车船等模型，比例精确，形态逼真，工艺精湛，造型具有逼真的立体空间感，完美诠释着中国古代建筑榫卯传统技艺，兼具艺术观赏价值和实用价

值为一体，堪称一绝。

民间竹扎技艺中即使简单的作品也要十多个榫卯构件，复杂作品要二千至三千个构件。所用工具非常多，主要材料有毛竹、502胶、骨胶、橄榄油、竹钉等。一件简单的作品需一至两天，复杂作品往往耗时一周甚至数月。而要达到竹棍部件之间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程度，则要艺人练习数年甚至更久。

民间竹扎技艺工序复杂，严谨精致。制作时需先构思大样，绘制作品图样，依照比例浓缩作品尺寸，设计各点连接、套接、选料；选料用料是关键，比较考究，须采用秦岭产的毛竹，太嫩不行，太老也不行，竹竿通直，竹节匀称，直径4毫米，竹节超过10厘米以上方才可用；经裁料、打磨、打眼，部分竹材料须经浸水泡竹、火工弯曲、磨具定型等步骤。再将楔子涂胶扎进打好的小孔，露出部分扎入另一竹竿空心，才能形成榫卯链接，环环相扣的竹制品。特别是竹竿弯曲技术利用水浸、熏烤、磨具定型，可将直杆竹子弯曲各种角度，是浓缩生活物品的再呈现，结构严谨，立体感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极具观赏价值。

2011年12月，民间竹扎技艺被西安市人民政府列入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9月，民间竹扎技艺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列入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

丰镐“三灵”民间故事传说

丰镐，史称丰京和镐京，也称双子王城，曾是西周国都。

周文王灭掉崇国以后，在崇国的旧址上营建丰邑，称为丰京，位于沔河西岸。在灭崇国第二年，他便把周人从宝鸡岐山脚下的周原迁至丰京。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继位，由于丰京狭小等因素，遂又在沔河东岸建立大城，取名镐京。丰京是周王室的宗庙和园林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中心。丰镐遗址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办和斗门街办一带，总面积逾25平方千米，是国家级文物保护遗址之一。

在丰镐遗址范围内，历史文化遗迹非常丰厚，典型代表有灵沼、灵台、灵囿^①遗址，人们称之为“三灵”。据文献记载：“囿中有台，台下有囿，囿中有沼也”。灵沼和灵台都在灵囿里面。所谓“囿”即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一种园林形式。灵囿是我国最早、最大的西周天子皇家御苑，规模宏大，林草繁茂，鸟兽众多，园林里养有麋鹿、白鹤等动物；灵沼是周文王的游乐场所之一，原位于西周丰京之旁，传说是在建造灵台用土时挖出的巨大人工湖。史书记载方圆达七十里，湖内游鱼竞跃，周文王常乘船穿梭其中；灵台象征着高山，是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是一个集观察气候、制定律历、于民施教、动员战争、占卜大事、庆祝大典、会盟诸侯等多功用场所。“三灵”并不是几处孤立的建筑，而是互有联系、相互配套的一个完整的体系。

查阅相关典籍资料可发现，历朝历代对丰镐“三灵”文化也都有传承和记载，诗经中记有《经始灵台》，同时《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记载：“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囚晋惠公于灵台。汉班固著有《灵台》，唐徐元弼著有《灵囿赋》，元《类编长安志》和1999年出版的《长安县志》亦有灵沼、灵台、灵囿的记载。颂扬西周君王“敬天、崇宗、保民、明德、尊礼、守法”的治国方略和“天主生，地主养君主教”及“明德慎罚，不侈无逸”的宗法礼制。孔子曾说，三代文化的继承，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重礼乐，振国威，推崇仁、德、慈、爱，才使孔夫子叹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丰镐地区的历代名人对“三灵”也特别重视，明秦藩王更名灵台



① “囿”（yòu），有围墙的园林，用以畜养禽兽。





为平等寺。灵沼湖畔的周祖宗祠，“灵沼瑞莲”成为关中美景之一，灵圃中的后稷庙和文王“运渡台”及灵桥、灵道成为古遗址。清同治年间关中书院山长^①柏景伟（灵沼冯村人）为赞颂“三灵”，编著《沔西草堂集》并在家乡办起书院“学稼园”，教出学子有赵舒翘（大原村人，清廷户部尚书），历代名人墨客对“三灵”也多有赞颂。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就源于《周礼》《周易》《诗经》等文化精髓，它以不同的表现风格，揭示了西周“崇礼尚德、敬天保民、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奠定了中华文明史，铸造了民族的精、气、神和人伦秩序的文明操守。西周礼乐的儒家思想，则千百年来早已融入国人血脉。

现如今，围绕“三灵”文化的各种故事传说，主要是指3000多年前发生在西周丰镐的逸文轶事。据不完全统计，经搜集整理的传说故事已达136个，其内容丰富，历史悠久，口口相传。其中有一个传说，则是在四千多年前，在丰水西岸，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大泽，它是巨人天神留下的脚印。在春暖花开、风和日丽之时，突然有一个部落贵妇姜嫄（也叫大嫄），骑着大马到处悠闲赏景，在途径大泽时被挡住去路，便下马在巨人脚印中踩玩，结果发现所踩之处竟有泉水喷涌，很快就形成了湖泊。回到家后，过了一段时间竟突然发现自己已怀孕，内心满是困惑和不解。在正常怀胎十个月后，孩子却未出生，更加奇怪的是一直等到了第十二个月，才分娩出一个圆圆的包袱胎，既不像人，也不像猫狗，便认为是不祥之兆，遂丢弃路边，结果被牛羊喂养。后又将婴儿丢到结冰的大泽处，不料被一只大鹏以翼相护。第三次则将婴儿丢到大泽附近的荒山野林中，结果又被虎狼哺育成长。接连经历诸事，姜嫄突然醒悟，这是上天赐子，便精心照顾培养，给孩子取名“弃”。传说汉字“遗弃”“抛弃”等词组便与此故事有关。从三次抛弃，又省悟抱“弃”回家，这个地方才叫“难弃”，后来逐渐住人形成村庄，这便是今鄠邑区南七村的地名渊源。“南七”可以理解为“难弃”易名演化而来。



“弃”是很有灵性的孩子，从小喜欢钻研农艺，当看到部落族人经常狩猎打猎一无所获时，便暗下决心要改变现状，于是开始踏遍山川河流和草滩湖泊寻找适合种植的植物果蔬。后来“弃”的精神感动上苍，便派神仙下凡，送五谷杂粮、稷谷新种，让他造福天下苍生。“弃”逐渐建立起威望，后人为纪念他的母亲，便给他们居住的地方起名叫大嫄，相传现在丰镐遗址附近的大原村村名便由此而来。

2017年1月19日，丰镐“三灵”民间故事传说被西安市人民政府列入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①山长，唐、五代时对山居讲学者的敬称。宋、元时为官立书院设置山长，讲学兼领院务。明、清时改由地方聘请。清末改书院为学堂，山长之制乃废。



刚家寨

距西安市北门4公里，距未央区政府所在地2公里。未央路从村西300米处穿过，凤城一路从村南而过，凤城二路从村中穿过，凤城三路从村北而过。东与十里铺西村、曹家庙村接壤，南与张家堡街道南康新村相连，西与雅荷花园相邻，北与西安市图书馆相接。3个自然村，5个村民小组。1993年总面积1905.2亩，其中耕地1521.7亩。2004年耕地23亩，2011年已无耕地。

1993年275户，1100人。2005年430户，1444人。2011年495户，1537人。共有27个姓氏，其中人数前五位的姓分别为：苏姓占29%，刚姓占27%，韩姓占18%，程姓占8%，孙姓占6%，其余依次为邵、李、王、张、刘、朱姓，共占12%。

相传元代至元年间（1271~1294）有村，明代为屯兵寨，以刚姓人为驻军首领而得名。刚姓至今为村中大姓。清嘉庆《咸宁县志》记载为东、西、南三村。东村位于刚家寨东部，是刚家寨村委会下属的第一、二村民小组。南村位于刚家寨南部，为村委会所在地，是刚家寨村委会下属的第三村民小组。西村位于刚家寨西部，是刚家寨村委会下属的第四、五村民小组。

唐时在万年县境内。明清为咸宁县午门社管辖。民国3年（1914）咸宁县建制撤销，划归长安县午门仓管辖。民国16年（1927）起归长安县渭滨区管辖。民国34年（1945）划归西安市第十一区管辖，区公所设在该村。新中

国成立后，该村先后归西安市第十一区人民政府第三乡、第四乡，未央区人民政府第三乡管辖。1956年3月西安市未央区马旗寨乡建立，归马旗寨乡管辖。1957年4月刚家寨三个自然村成立“曙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归马旗寨乡管辖。1958年马旗寨人民公社成立，曙光高级农业社改为曙光生产大队，属马旗寨人民公社管辖。1960年马旗寨人民公社更名为大明宫人民公社，曙光生产大队归大明宫人民公社管辖。1961年大明宫人民公社又恢复为马旗寨人民公社，曙光生产大队归马旗寨人民公社管辖。1966年马旗寨人民公社更名为跃进人民公社，曙光生产大队归跃进人民公社管辖。1972年5月跃进人民公社恢复为马旗寨人民公社，各村恢复原生产大队的名称和规模。刚家寨生产大队归马旗寨人民公社管辖。1977年曹家庙、十里铺西村、刚家寨、南康村合并为胜利大队。1978年又分开恢复原名称和建制。1979年后马旗寨人民公社又先后改为大明宫人民公社和大明宫西安奈良友好人民公社，刚家寨生产大队隶属未变。1984年大明宫人民公社更名为大明宫乡政府，刚家寨生产大队更名为刚家寨村民委员会，隶属未变。2000年3月，大明宫乡建制撤销，设立大明宫街道办事处。刚家寨为大明宫街道办事处管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2018年刚家寨村转为刚家寨社区。

由于地下水含氮量高，一直是粮食高产村，最高亩产达920公斤。1993年粮食播种面





刚家寨城改前

积1560亩，单产308.53公斤，总产量481.3吨。改革开放后，村里生产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到1993年底有村办企业2家，私营企业10家，职工总数211人，占全村人口的20%。1993年引进雅荷花园房地产项目，占地40亩，开启经济改革发展的第一步。随即凤城一路开通，多种经营、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2005年全村多种经营收入达338万元，非农生产人员占共劳动力的95%以上。此后农业生产快速消失，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快速发展，该村成为商业村，村里街道全部成为商业街，家家户户有门面房，城市化加快。2010年全村完成农民转居民工作，并全面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全村房屋全部拆除，准备就地盖楼回迁，群众生活全面城市化。1993年人均收入934元，2005年人均收入4800元，2011年人均收入12300元。

1979年前，全村均为土木结构的小瓦房，

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0平方米，2005年全村住上了砖混结构的楼房，人均住房面积超过90平方米。还建成五条商业街，平均每个村民有商铺30平方米。

新中国成立后村里学生在曹家庙上初小，在南康村上小学，在西安市第十一中上中学。1992年为方便学生上学，十里铺、曹家庙、刚家寨三村协商共建“三星小学”，占地20亩，建设三层教学楼3500平方米，建设办公室2000平方米，可接纳1300名学生，大大改善了三个村的教育状况。

村内有阅览室、老年活动站、书画活动室，另有锣鼓队、秦腔自乐班、健身舞蹈队。村内有门球场、健身广场等。每年坚持评选好公婆、好媳妇和十星级文明标兵活动，并给予物质奖励。给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养老金50元。

（资料来源：《西安村落记忆》）



百花村

位于谭家街道南端，太华路东侧，距街道办驻地约1公里。至2010年底，5个村民小组，460户，1664人。农村经济总收入3056万元，其中农民家庭经营收入1426万元，其他经济收入1631万元，包括工业收入512万元，建筑业收入505万元，年人均收入18365元。

现有民办企业4家，个体工商户35户。在村经济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村两委会为村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一是修建了村内道路3条，长达740米，群众出行方便，雨水排流畅通。二是改造旧村，建设新村。至2010年底，已建成楼房12栋，总面积达69000多平方米，大部分村民已乔迁新居。三是投资50万元新建百花村小学教学大楼，大大改善了学校教学条件。四是为全村农户安装有线电视。五是出资为全村村民办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六是关心老年人生活，凡是满70岁老人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50元，年满80岁的老人60元，年满90岁的老人80元。七是建设文化体育活动场地，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先后建成灯光篮球场、露天舞场、健身房等，安装健身器材6套，为群众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供方便。

（资料来源：《西安村落记忆》）





东方红村

位于北辰大道以东，浐、灞河以西，南邻赵村，北至袁维村。至2012年，由崖珥王村、上水腰村、下水腰村3个自然村组成。下辖7个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驻上水腰村西的辛王路西侧。762户，2664人，面积2470亩。

崖珥王：相传系元代王姓人居住河岸崖上而得名，《咸宁长安两县续志》称崖儿王，后改为现村名；上、下水腰：相传清乾隆年间称水腰村，因有南北二村，南村在上岸高土台上故称上水腰，北村在下岸低洼处故称下水腰，清嘉庆《咸宁县志》称水密四村，《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清末时称水腰坊上、下水腰二村。

因濒临灞河，水利条件较好，自古以来主产粮棉，兼产西瓜、甜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粮食生产及多种经营发展较快，粮食亩产最高年份达640公斤，多种经营收入最高年份195万元。改革开放政策为村民们指明了致富道路，村委会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在河滩地办起采沙场、预制楼板厂等建材工业，工业产值年年增长，最高年份工业产值达到1228万元。

1993年全村经济总收

入499万元，人均1300元，达到小康。至2010年底，全村共有农户675户，2005人。耕地102亩，夏季农作物产量30.6吨。全年农村经济总收入1303万元，其中农民家庭经营收入857万元，其他经营收入446万元，包括工业收入163万元，建筑业收入111万元。年人均收入6500元。2011年全村经济收入再创新高，人均达8000元。

全村有民办企业10个，个体商户16个。

2000年投资150万元新建了上水腰小学，又投资30万元为学校购置多媒体、微机、电视机等，并安装了锅炉，更新了教学设备。2008年村委会为全村村民办理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给65岁以上老人每季度发放生活补助费100元。给每年评出的五好家庭奖励100~300元。各自然村街道路面全部硬化，安装了路灯，污水排放畅通，全村有各种汽车50余辆。

（资料来源：《西安村落记忆》）



乡村文化振兴——

东堡村村史馆

在目前的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通过挖掘历史文化，形成乡村文化样态、文化场景、文化产业、文化主体等，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在这方面，西安市近年来做了许多努力，比如建设村史馆、文化广场等，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东堡村由温家山和吴家沟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温家山



村坐落在秦岭北麓终南山下，东有骆驼岭，西有小河梁。蛟峪河水由村西绕村向东北方向流去。吴家沟村相传建于唐代，以姓氏得名。

东堡村村史馆建于2019年，系利用原温家山村委会办公室建成。

东堡村村史馆由本村党员干部设计布展，并得到了本村群众的大力支持。布展分为农耕展示区和灶房展示区，如实反映了本村民俗文化和乡土风情。





守岁

(唐) 李世民

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注释】

馥：浓郁的香味。

盘花：在此特指祭祀用的贡品。

【赏析】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作于贞观年间的诗，他作为一代明君，其自身文学造诣很深。这一时期国家康泰安定，繁荣昌盛，李世民于春节之际有感辞旧迎新之情，所以写下了这首气氛祥和、节味浓郁的作品，从而表达自己的闲适、安然之情。

全诗以过年时守岁的情形为主题，而且又依托皇宫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景，其景致自然更为别致一些。太阳已经西下，华丽的宫殿之内被装扮得金碧辉煌，处处流光溢彩。在这样的氛围中，冬之寒岁即将过去，而暖意融融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巨大的红烛点燃了，远远看去像一簇簇花团，看那祭祀祖先的供品多么庄重。君臣一起庆祝新年的到来，良宵共守，辞旧迎新，这是何等热闹而又美好的时刻！

全诗并无独特的写作技巧，但这份直白显得平实，诗人以己心度人心的感受使我们读起来也仿佛置身其中。



冬夜书怀

(唐) 王 维

冬宵寒且永，夜漏宫中发。
草白霭繁霜，木衰澄清月。
丽服映颓颜，朱灯照华发。
汉家方尚少，顾影惭朝谒。

【注释】

夜漏：漏，指漏壶，古时，人们以漏壶记时。

霭：密集、浓密的样子。

尚少：典出“白首为郎”，以郎官颜驷的三朝不遇，寓指怀才不遇，久不得提拔。尚，崇尚、喜欢；少，少年。

【赏析】

本诗开篇明义，首联以“寒”与“永”点出了冬夜的寒冷与漫长，又以“夜漏”“宫中”点明了时间与地点。颔联以细腻的笔触写景，在清冷的月光映照下，被浓密寒霜覆盖的草木愈显衰颓，而在衰颓的草木映衬下，月光也愈显清冷。短短十字，却营造出了一种暗夜孤独，凄清悲凉的气氛。颈联，笔锋一转，由景及人，描写明艳的灯火下，身着华丽服饰，却已鬓生白发、年华老去、容颜衰败的人。“丽服”与“颓颜”，“朱灯”与“华发”的强烈对比，更凸显了夜半孤人、郁闷凄凉的境遇。尾联点题，借白首为郎的典故抒怀，汉家天子喜爱器重年富力强的官员时，我已垂垂老矣；顾影自视，再也无颜步足朝堂，谒见天子。

全诗笔法细腻，文字清新却疏冷，以景及人，借景抒情，既道出了冬夜的萧瑟漫长，又指出了斯人的年华不复、怀才不遇。景与情，情与人，水乳相交，浑如一体，隽永之余，颇值得细细品读。





西安市区县地方志工作座谈会召开

为进一步推动西安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2月6日市地方志办组织召开区县地方志工作座谈会。市地方志办主任王鹰、副主任崔义萍、一级调研员杨军亚，区县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和有关业务骨干，以及市地方志办相关处室负责人等近3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副主任崔义萍主持。

会上，各区县能够在立足主业、开展志鉴史编修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结合本区县地方志发展实际，按照地方志“十业并举”发展要求，提出了2023年区县地方志工作开展思路 and 具体举措，并对市地方志办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王鹰主任最后强调，各区县要立足我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挥好“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为大西安的发展贡献方志人的力量。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地方志工作的重大意义；二是要严格落实“一纳入、八到位”要求，确保地方志工作有序发展；三是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史志鉴高效率、高品质发展；四是要广泛开展读志用志，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五要深挖地情特色，发挥主动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阎良年鉴（2023）》编纂工作培训会召开

人勤春来早，奋斗正当时。春节刚过，阎良区为全面落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做好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2023年卷编纂出版工作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提升综合年鉴的编纂效率和质量，区档案馆提前筹备、有力组织，于2月2日召开了阎良区2023年鉴培训会。本次培训会有区级机关各部门、直属事企业单位、人民团体、街道办事处、驻区单位等供稿单位、100余人参加。会议由区档案馆吴娟芳副馆长主持。

会上，对《阎良年鉴（2023）》编纂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对年鉴的时限范围、内容范围、各单位报送资料、编纂要求、报送时限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并印发了《关于做好〈阎良年鉴（2023）〉资料报送工作的通知》。赵粉花副馆长结合近几年年鉴的编纂情况，对年鉴编纂业务进行培训，围绕篇目设计、大事记、图片、人物、条目撰写等方面，依据中指组和省、市地方志办有关年鉴质量规定进行讲解，实例丰富，针对性强。

通过本次培训进一步加强了阎良区年鉴工作的组织领导，压实了工作责任，提升了阎良区年鉴编纂人员的业务素质，为打造精品年鉴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西光社区 举行社区志编纂启动仪式

2023年2月21日，西光社区举行社区志编纂启动仪式。新城区地方志办、长乐中路街道党政办、西光公司、光电股份、北方医院、西光中学、西光实验小学、西光幼儿园共8家单位20人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由西光社区党委书记任晓超主持。仪式上，任晓超宣读编纂小组任命决定，聘请社区原居委会主任党明为《西光社区志》主编。党明简要回顾了西光社区的历史和现状，对与会单位的资料收集提出了具体要求，并表示要竭尽全力编纂出一部彰显时代特征，体现区域特色，凸显西光社区发展脉络的精品佳作。区地方志办主编杨向曦就如何做好社区

志的编写进行了辅导。长乐中路街道党政办副主任李想强调西光社区党委要加强组织协调工作，驻地单位要积极参与配合社区志的编纂。最后，任晓超表示西光社区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突出地方特点，讲好西光故事，深入挖掘西光社区历史文化，记录好西光社区的发展成就，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社区志编纂任务。

《西光社区志》作为我市首部启动编纂的社区志，既是顺应时代变迁的尝新之举，更是延续修志传统的份内之责，必将为全面推进全市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编纂工作提供有益探索和宝贵经验，为西安文化建设增光添彩。



碑林区开展志书“六进”活动

2023年2月，碑林区地方志办公室开展志书“六进”活动，向保吉巷社区、西何社区赠送首轮《碑林区志》《碑林区志（1994-2008）》及《碑林年鉴》2011卷至2022卷等志鉴书籍50余册，特付诸展阅，奉飨于读者。

南院门街道保吉巷社区面积600平方米，建有“幸福书苑”，藏书3000余册；张家村街道西何社区面积580平方米，建有“电子阅览室”，藏书3000余册。

此举有效传承和共享了地方志鉴文化资源，有力推动区情知识的普及和志鉴存史、资政、育人功能的发挥，提高了方志文化影响力，使地方志文化蕴含的文化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升华。





品古都前世今生——《阅读西安》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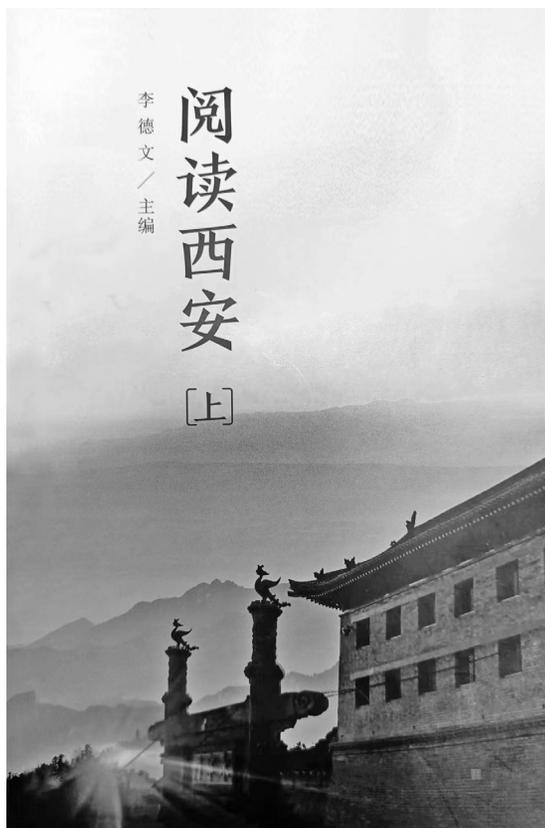
近日，《阅读西安》一书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长期工作在西安、热爱西安百态生活的李德文先生主编，众多专家和学者以及在西安发展改革中的参与者共同编写完成。该书记述全面、资料详实、视角独特、表述新颖，为广大市民群众和海内外游人商客品读西安历史、感受西安烟火、期待西安未来提供了新工具和新途径，堪称新时代西安发展的“小百科全书”。

《阅读西安》共计约70万字，分上、下两册，三大板块十个章节，相关作者结合工作经历和生活体悟，分别阐述西安历史文化、西安发展与愿景和全书关注重点。其中序言部分通过五个片段的史实叙述，以西安城墙文化为基座，围绕千年古都厚重的历史沉浮和发展脉络，回顾了近现代西安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和城市复苏轨迹，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通过“开发区金名片”助力西安发展步伐按下快捷键，以旁观者的角度对城市治理作了些许思考并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

全书在章节叙事部分，远可追溯到百万年前，从蓝田古人类聚落说起；近可回溯到2022年，描述生态宜居的美丽西安。时间跨度达百万年之久，历史与现代交融，给人一种强烈的古今穿越画面冲击感。在挖掘整理史料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介绍了西安的历史沿革、行政区划、区县和开发区概况、历史典故和人文遗迹景点等基本情况，几乎囊括了有关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所有重要历史片段和背后的故事。

该书在内容和叙事方式等方面也略显与众

不同，颇有特点。一是图文并茂，既有史料语言的详述，又通过选取彩图插图、罗列表格数据弥补语言描述的繁琐和不足，相得益彰；二是内容全面，全书不再仅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某一方面深入具体描述，而是通过诗歌、重大活动、元首访问、外国人眼中的西安、智慧城市实用技术等多角度展开，多维度立体化全方面呈现西安魅力，改变了大众对西安只有城墙和兵马俑的刻板印象，为大家展现了一座有血有肉、古



今并存的鲜活西安；三是浓烈的地域特色，西安的景点和故事太多太长，作者抓大放小、提纲挈领，针对不同区县或开发区，选取如临潼火晶柿子、鄠邑农民画、高新区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或特产，让读者瞬间就能知晓或回忆起地域间的特色和不同；四是严肃与活泼并重，对于例如老牛婆遗址、贞观之治、西安事变、非遗传承等情况介绍，书中引用权威资料陈述，给读者呈现出严肃庄重的西安画像。通过方言说西安、深情唱西安等章节，将方言与普通话完美互译，又让人在深入了解西安厚重历史的基础上，增添了些许活

泼和震撼，向读者刻画出了一幅温情而又具激情的西安画面。

站在读者的角度，只要仔细阅读全书内容，轻轻触摸文字的温度，就能感受到自秦汉盛唐以来的文化底蕴和穿透力，古都的人文历史脉络逐渐清晰，仿佛跃然纸面，浮现于脑海中。

该书的付梓，为真正了解西安、融入西安、拥抱西安的读者朋友，开拓了全新的视野，更为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西安实践奉献了智慧和力量。或许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海内外游客“阅读西安”的案头书。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故史籍

白首为郎

解释：郎，汉朝官职，随侍皇上左右。

出处：《汉武故事》载“武帝尝至郎署，见郎官颜驷‘须鬓皓白，衣服不整’……”。

故事：有一天，汉武帝刘彻乘车来到宿卫侍从官的公署，看到颜驷满头白发、眉毛也很长，就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做郎这个官职，为什么这么老了？”颜驷回答道：“臣下在文帝刘恒的时候担任郎这个官职了，文帝喜欢文臣，而臣下好武；景帝喜欢俊秀的臣下，而臣下貌丑；而如今陛下即位了，欣赏年少有为的人，而臣下已经老了，所以三朝都没能得到提拔，所以现在还是个郎官。”武帝听了十分感慨，以会稽郡都尉之职赐之。

民间后来有“悲颜驷”“白首为郎”的说法，以此来形容怀才不遇。





《未央区志（1994~2010）》获省级质量评定优秀成果。对于我来说，这是2022年底唯一的好消息。对于已经逝去的2022有诸多感慨，尤其年底，接连有熟人离世，其中也有我的家人，接着是撂倒众人的“羊羊”，也是来了个亲密接触。是这个好消息，犹如冲开云雾的阳光，温暖了一时感伤的心房，编修区志的过往便一幕幕浮现于眼前。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档案馆翻阅资料并记录；冒着酷暑前往航天城的印刷厂跟机修改样书；区志办的灯光总是在天未放亮时亮起来，欢声笑语也从那个房间传出来……

拿出《未央区志（1994~2010）》，厚达七公分，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志共设建置沿革、地理、城乡建设、文化遗产、社会等32编，编纂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采取横排竖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方法分类记事，共170万字，全面系统地记述1994~2010年间未央区自然、经济、政治、

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勾画了未央区由城市郊区迈向中心城区的发展轨迹，是一部了解未央区的百科全书，是未央区的文化名片。

笔者未入区志办前，这里已经进进出出换了几波人。刘超基老师是坚守这块阵地的人，是区志办的掌门人，他的头衔是未央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未央区志（1994~2010）》主编，我们习惯叫他刘主任，他这个主任绝对是在其位干其事的实干家。2004年，在第二轮区志即将启动之际，为了区志工作向前推动，他把好朋友王方平老师请过来，与他共同支撑这个没成形的机构。之后又有杨书绅、杨忠诚、焦增喜、褚新中、李有生、李新平、项文武、王丁昌等加入，又经几番变化，到2014年编修队伍达9人，也稳定下来，分别是刘超基、杨书绅、王方平、薛民财、郑志辉、李有生、王洋、沈桂红、王雅雯。这其中，除了沈桂红和王雅雯两位女同志，其余都是花甲以上年龄退而不休被返聘来的。他们都是思想过硬，品行端正，具有奉献精神，工作



扎实，有理论水平与文字功底，对未央区情了若指掌的人才。

每天早上，办公室里就传来刘主任欢快的口哨声，吹的是红色歌曲，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这可是他的独门绝技——口技，他喜欢秦腔，会拉二胡。一说起来想当年，也是多才多艺的帅哥一枚。在工作中，他是“响鼓就得重锤敲”，为了提高编辑的编修水平，固定在每周一上午召开例会，除了正常的工作汇报，接下来就是学习，学习区志和年鉴编纂方法、中指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文件精神。他从《中国地方志》《陕西地方志》《西安地方志》中挑选值得学习的篇章作为学习范本，给大家念读，让大家把写出精品的思想牢牢树立起来。哪怕你是小白，经过每周一次的学习，对编写区志也有了概念，更何况这些都是有些文字功底的老师，就跟建楼房一样，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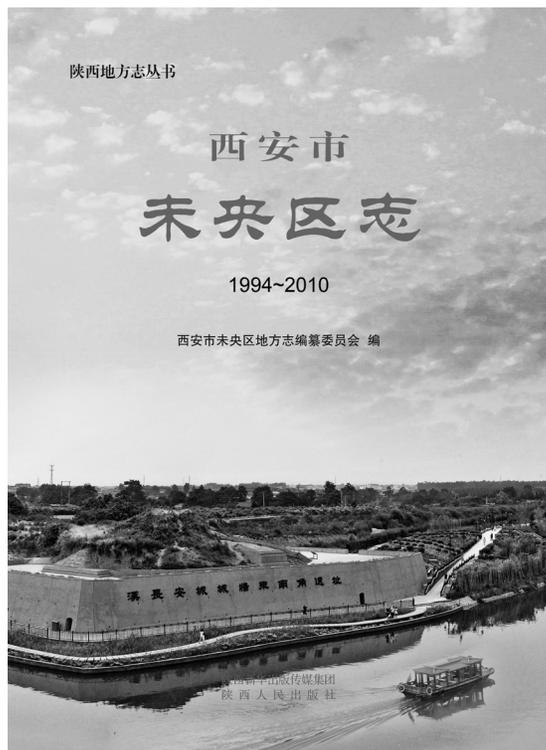
础就这样一块砖加一块砖的垒起来。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工作，还有修志的全盘部署，修志通讯的编写，与市志办工作的衔接，与兄弟区县的沟通交流，所有编辑的家庭情况及身体状况都在他的操心之列，尤其是大家的工资待遇问题，他最上心，积极地找领导沟通，结合其他区县修志人员待遇情况，给大家争取待遇的提高。当然，大家对工资并不是多么热衷，想挣钱不会来这里工作，都是出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但是，不能否认，他的这份争取给了大家更大的干劲，也体现了几位主管领导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他的办公桌上有厚厚的稿件，身边的小几上摆着厚厚的报纸，《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西安晚报》等等，他都要抽时间翻看，一旦发现跟未央区有关的报道，他就会细心的裁下来，保管起来，成为资料来源的一部分。他对区志工作的热爱不只是在岗这二十年，离职后，他还是惦念的，关心着后面“一年一鉴”的工作，时常会打电话询问，感觉区志工作就像他的子女一样，成了他不能割舍的一部分。

编修区志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工作，若在外闲聊时说起“区志办”这个单位，很多人都会发愣。因此，在这里工作的结果就是一本书写成，也还是默默无闻的。然而，这世上偏偏就有人喜爱这项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就是喜欢，他就是杨书绅，我们的杨老。

杨老是雁塔区人，1950年入伍当了空军，一直保持军人的作风。他是参与《未央区志》首轮与二轮编修的唯一一人，首轮区志编修中他是总校之一，他的校对一丝不苟，首轮区志近130万字，没有一个错别字，不由让人肃然





起敬。他也是区志办年龄最大的，初见之时，他已年过八十，我却压根没看出慈眉善目的他有那么大年龄。腰背挺直，走路带风，看稿件不戴老花镜，满面红光，精神矍铄，脑子里就闪出四个字“鹤发童颜”。记得那年，区老干局组织老干部爬山，有个年龄限制，要75岁以下，也就没有杨老名字。他不服，也不多说，直接前往老干局，让他们见识见识他的体格，看看他比那些七十多岁的人强还是弱。果然，他成功加入爬山队伍。

杨老还是一个勤快干净之人，他的书桌上堆满文稿，都摆放整齐，桌面上一尘不染。拉开他的抽屉，里面也是摆放有序，一点不乱。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他首先拿起拖把就去拖地，要么就拿抹布抹桌子，其他人打扫不打扫他都不理会，也从不提要求，并且他很自律，不迟到、不早退，总是步履坚定，风雨无阻。这点对我影响很大，也争取每天早点来，跟他一起打扫办公室。

他干起工作来特别投入，进入工作便心无旁骛，在那里逐字逐句地咬文嚼字，对待文稿没有一丝的虚头巴脑。“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不了”是杨老的信条，他别的没有就是书多，他家里有一屋子的书籍；在单位打开他的专用柜子，里面辞海、辞源、字典、地名志以及各种区情工具书，应有尽有，他一直秉承着区志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件事都要有依据。为了查找短缺资料，他一人挎着他的包包去基层单位查找，很多时候他一个人坐在档案馆里一坐几个小时，一篇篇文件的过手，手抄资料几十本。他就是这样，干着他能干的一切，从来不倚老卖老去教导人，有的只是耐心，帮着解决问题，似乎他的眼里只有志书稿件。有这样的人在未央区志办坐镇，还愁不出佳志吗？

他对编写区志的热爱已经不是“爱岗敬业”这四个字所能完全体现的，那是他骨子里优秀品质的体现，已经达到了高层次文化的境界。在我眼里，他就是我们区志办的一尊佛，言传身教的范本。

如果说作协里聚集的是肚里有墨水的笔杆子，那么区志办里就没有滥竽充数的笔杆子。

李有生老师，是校对高手，且腿脚勤快，酷爱写作，常有文章发表在一些期刊上。他写得一手好字，虽然他会把手稿写得龙飞凤舞让人难以辨认，但是他写起书法来那是很见功底的，至今，他那幅“知足常乐”的书法作品还挂在办公室墙上。

王方平老师曾当过语文教师，当过校长，后又调到政研室编发内刊《未央调研》，他擅长作诗，每每是提笔就来，真的是“下笔如有神”，我们就可以想像他读过多少书。他曾自拟对联“学海泛舟尽览天地美景，词林漫步备赏古今奇观”，可见读书学习对他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离开区志办后，将自己多年所感所写结集出版，书名《随笔可鉴》。

薛民财、郑志辉、汪洋三位老师，都是军人出身，都是从局长岗位上退休的，主要负责编辑《未央年鉴》，在《未央区志（1994～2010）》后期修改阶段，由于人手紧张，也加入了修改工作。我不爱说“发扬革命主义战斗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但是他们三人往那一坐，你就知道老革命都是怎么干工作的，军人所具有的那一股精神气仿佛印到了他们的骨子里，也看不出他们都曾经当过局长。

薛民财老师，喜欢跳舞，喜欢写诗，未央机关工委“五老”之一，常常不留名地做慈善。喜欢在微信上编辑相册，遇见美好的事



物，他都会收集起来做成相册。他是年鉴编辑部的主管，接手《未央年鉴》编辑工作时，基本是个“小白”，也没有师傅传帮带，他就找来相关资料自学。同时，他对电脑操作也比较生疏，就也学起来。每天他都晨练后早早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开始相关工作。在他的不断学习进取下，制定篇目大纲、进行总纂等，一步步成长为具有相当水准的年鉴编辑。

郑志辉老师喜欢书法，记忆力强，有一肚子故事。讲起故事来，会吸引得我们跟听评书一样入了迷。我常常想，如果他拜入哪个评书大师门里，一定是个说书高手。汪洋老师，话不多，总是默默地干着自己的事。他们跟着薛老师一起，也是从自学开始，学电脑，学年鉴编写方法。编写年鉴跟编写区志最难的就是收集资料，不但打电话催，迫不得已时还得跑到相关单位找到主管去沟通。好在，他们三人都是区上的老干部，常常用“老脸面”，搬“老关系”，时而像兄弟，时而像长辈，时而会听到他们对着电话说：“哎，你老哥对咱工作不支持嘛……”，反正他们是想尽办法、磨破嘴皮地完成资料收集。

一部志书的完成，需要最基本的三个条件：第一是领导重视；第二是资金到位，第三是高素质的编辑团队。这里面最重要的是领导重视，尤其是分管与主管领导。那个曾经分管的区级领导张发俭，经常到区志办看望这些

老同志，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办公室设备是否到位等等；主管我们的办公室主任赵发宝及副主任刘迎，还有后来成立区志科后的主管科长齐倩，他们工作再忙也挂念着修志的情况。他们协调解决了办公用房、人员、经费、用车、设备等实际问题，保障了修志工作的正常运转。

自然，一本志书的完成离不开基础资料，离不开区级各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通力合作，是他们为编写区志提供了充裕翔实的资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有那些摄影爱好者王宏、李建宁等，奉献出自己多年的摄影作品。

不管怎么说，《未央区志（1994～2010）》是众手成志，是几番推倒重来，无数次修改而得，是修志人甘坐冷板凳，不计个人得失，不避辛劳，呕心沥血，斟字酌句，刻苦钻研，不需要豪言壮语，只凭着一股热爱的劲头，为社会捧出的一部取材丰富，考据精良的资料著述。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可以说这170万字是用奉献的汗水凝结而成，换来“省级质量评定优秀成果”这一殊荣，是众望所归，也让修志的我们甚觉欣慰。修志的人都是普通人，都是滚滚红尘里一粒尘，却愿意为书写某一段历史，做着重复又意义重大的事，不怕艰难，不求闻达，踔厉奋进，矢志不移。

（作者单位：未央区志办）





《西安地方志》征稿启事

《西安地方志》是经省新闻出版局批准，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方志专业双月刊（内刊），集理论性、知识性于一体。创刊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更好地促进修志编鉴工作，推动读志用志，现广泛征稿。

征稿范围：

西安行政区内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近现代重要事件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性文章或口述整理，以及其他地域历史研究成果；有关西安地域年鉴、修志、旧志整理、地情书籍编纂等方面的理论文章；出生于西安的著名历史人物和在西安居住、工作的著名外籍人物的相关研究成果；讲述西安的山水、文物、遗存、景点等方面的文章；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地方民情、风俗、物产、民间故事等；有关西安的游记等。

稿件要求：

1. 稿件应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实用性、创新性，内容真实、逻辑严谨、文字准确、语句通顺；
2. 史料性稿件，最好配有反映文章内容的图照；
3. 学术文章一般5000字以内，引文符合国家规范。编辑部对来稿有删修权，不同意删修的稿件请在来稿中声明。
4. 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职务、职称、详细地址、电话、邮编。
对于选用的原创稿件和转载稿件，支付一定稿酬。

投稿邮箱：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34号信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邮 编：710007 **联系电话：**86788731，86788732

QQ：674292617

（请被本刊转载文章的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2月2日，《阎良年鉴（2023）》编纂工作培训会在阎良区档案馆召开。



2月21日，新城区长乐中路街道西光社区举行社区志编纂启动仪式。



2月1日，碑林区地方志办公室开展志书“六进”活动，向保吉巷社区、西何社区赠送志鉴书籍。



西安城墙又称西安明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10月，西安市城墙·碑林历史文化景区升格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西安明城墙位于西安市中心区，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轮廓呈封闭的长方形，周长13.74千米，面积11.32平方千米。西安城墙主城门有四座：永宁门（南门）、安定门（西门）、安远门（北门）、长乐门（东门），这四座城门也是古城墙的原有城门。从民国开始为方便出入古城区，先后新辟多座城门，至今西安城墙已有城门18座。从永宁门开始顺时针依次为：永宁门、朱雀门、勿幕门、含光门、安定门、玉祥门、尚武门、安远门、尚德门、解放门、尚俭门、尚勤门、朝阳门、中山门、长乐门、建国门、和平门、文昌门。

朝阳门。东城墙最北一门，原为1939年开辟的“崇礼路防空便门”。1954年成大豁口。1980年代末，决定修复豁口以建城门，同时因其地处城东，故取“迎着太阳升起”之意命名为“朝阳门”。1992年，正式修筑朝阳门。1993年券修成现在规模并正式命名为朝阳门。

西安地方志

主 办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地 址 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
 市政府大院34号信箱
邮 编 710007 电 话 029-86788731
邮 箱 674292617@qq.com
网 址 <http://xadfz.xa.gov.cn/>